

“框架”台灣：日治時期殖民現代性的研究

“Enframing” Taiwan : The Study of Colonial Modernity in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陳其澎\*

摘要

納粹德國在 1930 年佔據波蘭時，強制驅離波蘭人，並將原有波蘭的原野景觀徹底改造成德國人理想中歌德年代(Goethe-age)的景觀，是指那些由詩人(包括歌德)以及繪畫中所呈現**理想田園景觀**，這是強制改變殖民地的空間結構。Timothy Mitchell 在其書”殖民埃及”(Colonizing Egypt)曾提出一個”框架”(enframing)的觀念，亦即是指殖民國家透過其殖民力量所進行的結構化的視覺表徵，運用區劃、歸納、類化等技巧以進行對被殖民地進行馴化的工作。班尼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其著作《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中提到”人口普查、地圖、博物館”三者有形塑殖民地的想像領域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這些工作的具體表現的結果，展現出來確實是現代化的成就，是一種殖民現代性的具體成果。讓被殖民者，特別是精英份子特別的心儀，遂造成如後殖民主義論者自我與異己的矛盾，因而產生認同的紛擾。

在本文的討論中，將引用 Timothy Mitchell 的殖民埃及，傅科(Foucault)的生物政治(Biology politics)的觀念進行對日治時期殖民現代性情況的描述，包括：輿圖建構、輕便鐵路建設、水利建設、博覽會、皇民化教育等的研究分析。其內容至少包含：一、皇民化教育的範型：君が代少年與沙鷺之鐘的殖民意涵；二、帝國之眼：台灣山岳凝視；三、台灣博覽會的殖民意義；四、幾何的方法：理性空間與時間；五、輿圖建構與水利建設、輕便車建設。其中常是透過各式各樣，看似平常的作為來達成的，本文主要的研究目標，即在於解讀與闡明日治時期殖民現代性中各式隱藏性的意涵。

**關鍵詞**：框架；後殖民主義；日治時期；殖民現代性。

---

\* 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系副教授  
E-mail:chiepeng@cycu.edu.tw

## 壹、緒論

在 Timothy Mitchell (1991) 《Colonizing Egypt》一書中的”Enframing”專章的論述，正可以引用於解釋 1895-1945 年日本統治下的殖民台灣。在日本殖民政府有計劃的推行種種殖民現代性的具體作法後，其透過殖民力量的施為，一步步地架構台灣。對於殖民日本與被殖民台灣之間的種種現象確實與 Mitchell 所描述的埃及有幾分神似，Mitchell 討論了殖民政府如何利用分區(regimentation)、幾何(geometry)、個體化(individualization)，就如同傅科(Foucault)式的泛視系統(panopticon)，以便於殖民與統治包括埃及與阿爾及利亞。他將埃及的殖民社會解釋成是西方世界以理性的空間與時間觀念駕馭東方世界，並引用傅科對於泛視系統的分析，說明如何利用西方的理性化、個體化、孤立化殖民地子民。讓他們從隱晦難明(invisible)變成清楚易見(visible)，而讓國家機器輕易地支配。Mitchell 利用幾何(geometry)方法，說明殖民政府分離、孤立、個別化人民的企圖是十分明確。利用幾何方法做為一種控制的工具，這是與傅科的泛視系統有異曲同工之妙。只是傅科利用大阿哥之眼(big brother's eyes)監視下屬團體，而 Mitchell 的觀念是認為殖民統治者利用有效的空間管制使其人民個體化，因而使其完全地暴露在監視的凝視中。他的觀念是相當具有建設性的論述。雖然台灣的殖民現況與埃及並不盡相同，然而日本殖民政府為了達成殖民的目標與權力，其所引用的幾何方法，其實在立場上是一致的。

本研究即依此方向進行研究，企圖以日治時期種種殖民現代性的具體表徵做為研究的樣本。其中就資料的類型而言，包括數字資料、文字資料、圖象資料等三大類型；就內容言包括：人口普查資料、地籍資料、地圖檔案之建立；博覽會、公用建築與市區改正、輕便鐵道、水利系統、皇民化教育等。而這些殖民現代性的成果，表面上給當時的被殖民者的心中，至少是對多數精英份子而言，都留下深刻的印象。這些對於日本殖民正當性都起了極為正面的效果，甚至在現在的台灣，都尚是許多老一輩的台灣人津津樂道的回憶(夏鑄九 2000:74)。然而其背後隱藏的種種意涵，若依傅科(Foucault)的觀點看來，所代表的正是一種規訓的力量，統治的殖民政府就是利用種種框架，來讓殖民地變成一個淺顯易讀的文本，不但統治者可以恍若翻閱地圖般輕鬆愉快解讀，更甚者是，被殖民者只能依循殖民者的旨意閱讀，而這正是滿足殖民者的統治企圖。因此正確解讀日本在台期間殖民現代性隱藏的意涵，正是本文的主要目標。

後藤新平以科學主義為基礎的生物學政治，認為殖民政治就是一種生物學的政治。利用調查、統計的方法以做為政策制定之參考，並在此觀念下展開了政治、經濟、社會、人口、自然資源的各種調查工作(溫振華 1985:72-74)。這與傅科(Foucault 1979)所提出的「生物政治」(bio-politics)觀點相近，二者都訴說著一種知識與權力的關係，更重要的，此二者都試圖對人民的生命做出最詳細、最詳盡的管理及干預。後藤新平以所謂「生物學原則」的精神，嚴謹而詳細的從事整個台灣的研究與調查：大至整個台灣地形地貌的調查，小至各式野生動植物的標本採集；從台灣社會舊慣的研究，到全面的人口普查；從土地地籍的清查，到

農村牛隻牛籍的數目及異動…等等各式各樣巨細靡遺的調查。

日本政府據台之後，首先展開的是土地的調查而非人口的普查。土地的調查，目的不僅是增加對地形地勢的了解，更重要的項目即是對於地籍的清查。舉例來說，根據日本接收自清朝的土地帳冊顯示，生產稅收的土地總共約有 867,000 畝，不過日本政府調查之後，發現真正的數字應該是 1,866,000 畝，許多從未被課過稅的土地所有人將要為所擁有的土地繳稅（Kerr，1974：86）。當然土地調查的功能不只一端，矢內原忠雄(2002)在其著作《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中，對於土地調查的功能及價值作如此的描述：

土地調查的效果：一是明白了地理地形，獲得治安上的便利；二是整理隱田，土地的甲數增加，(中略) 財政收入增加；三是經濟上的利益，即因確定土地權利關係，土地的交易獲得安全。(中略) 土地調查成為台灣資本主義化、日本資本征服台灣的必要前提及基礎工程(p.18)

有關人口的普查部分，日本政府對於台灣的人口普查始於 1905 年 10 月，第二次人口普查則是於 1915 年進行，之後至 1940 年為止，每五年進行一次類似的普查。整個日治期間，台灣人民一共被清查了七次之多，全面調查的結果，不僅僅是將原本不明的總人口數查清楚，更進一步的，是將島上的每一個人，都劃分出了各自的分類：性別、年齡、戶籍地…等等，許許多多的條目，將每一個人自雜亂無章的群體中獨立出來，對殖民者而言，一個個體一但有了清楚的地位，他的一言一行自然能夠加以注意。日本殖民政府對殖民地台灣進行的人口普查，不僅在時間上較日本本國早了十五年，在內容上亦是較為詳盡，其原因其實不難理解，殖民統治者眼中的台灣人自然不若日本本國的人民來得良善，全面的人口普查，方便殖民者來加以控管。這就如同傅科提到的，那些被規訓權力控管的人較一般的人更**個體化**（individualized）：在規訓的體系中，小孩比成人更個體化，病人比健康的人更個體化，瘋子與罪犯比那些正常守法的人更個體化。

其規模與詳盡程度可以由 George Barclay(1954)在其有關《台灣的殖民發展與人口》(The Colonial Development and Population in Taiwan) 中的一段話作為印證：“在日本統治之下，台灣很可能稱得上是全世界被調查的最詳細、最完整的殖民區域。每年有大量的統計數據、特殊的數字調查不斷地被編纂。經濟、地勢、原住民部落、礦藏、農產品、工業產品、以及外貿等全部被調查及再調查，一直查到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再加進原先的知識之中”(引自姚人多 2001:125)。

大量的統計數字及研究資料所為為何？為的是日本殖民政府能夠更快速，更有效的掌握其殖民地的一切資訊，透過這些數字及研究，將原本日本人眼中混亂的台灣，建構成一個清晰、有條理的知識體系。因此，調查的愈是徹底，也就代表了控制的愈徹底，也就是說，外來的殖民者透過他們自己的方法，一步步的將台灣分解成他們眼中的台灣、轉換成他們可理解的台灣，就如同 Mitchell 說過的一句話：「殖民權力要求這個國家變得可以翻閱，就像本書一樣。」(Mitchell 1991:33)

如此的歷程，正如同 Timothy Mitchell 於《殖民埃及》中提出的「框架」

(enframing) 概念，意指殖民國家透過其殖民力量，對被殖民者進行結構化的意義表徵，進而透過區劃、歸納、類化等技巧，將種種的表徵深化進入被殖民者的腦海中，最後只能依循殖民者的旨意閱讀。因此，台灣在整個日治時期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們如果對於其中的政策、建設、或事件…等等進行較仔細的思考，將各個方向的訊息整合在一起，我們將會發現台灣在日治的五十年間所進行的，是一種主體缺席的殖民現代性（夏鑄九，2000:65）。在整個現代性的建構中，台灣人民的主體性是缺席的，有的只是日本殖民政府單方面的主體建構，不論是台灣的社會文化、或是台灣的地景地貌，都被殖民政府以一種「刮去重寫」的方式，重新以殖民者的角度再詮釋與再建構。尤有甚者，殖民者所建構起的認知與知識，透過各種規訓的方法（其中又以教育為主），反過來成了被殖民者（台灣人）用以看待台灣社會的方式。

## 貳、皇民化教育的範型：君が代少年與沙鷺之鐘

就如同前文引傅科提到的，那些被規訓權力控管的人較一般的人更個體化（individualized）。在規訓的體系中，小孩比成人更個體化，病人比健康的人更個體化，瘋子與罪犯比那些正常守法的人更個體化。教育所代表的規訓力量，就如同傅科一再描述的，是一個產生馴化個體、產生「社會可用之人」的過程，教育的文本必定是由統治者決定的；一般的或同民族的教育已經如此，可以想見到，以不對等政治、軍事、經濟力量進入他國的殖民統治，對於殖民地人民的教育內容，會是如何地呈現殖民與被殖民雙方的樣貌。普及教育，這一個最有效也最為隱蔽的殖民統治型式，自然成為日本政府努力推行的目標。因此在日本政府的眼中，小孩既然比成人更個體化，透過小學教育系統的推廣，更利於建構普及教育皇民化教育的範型，職是之故，自然造就「君が代少年」與「沙鷺之鐘」（月光小夜曲）的殖民教育神話。

### 一、君が代少年的神話

筆者曾於苗栗公館鄉石圍墻庄做田野調查，讀過陳漢初(1991)《石圍墻越蹟通鑑》中說起詹德坤：“詹德坤十三歲亦受重傷，其父在旁看護，德坤掩自己之苦，請其父歸去內山家中，探望他母有受傷否，聞者無不感動，此是大中之美談也。”在訪談每一位耆老的過程中，詹德坤的故事也是石圍墻庄民最為津津樂道的故事。在這純樸的客家庄頭，發生了一個跨海越洋流傳的「君が代少年」故事，這是一個外來統治者所給予台灣民族的神話，引用王明珂集體記憶來解釋此現象：

民族似乎是由一個由集體歷史記憶的凝結與傳遞來維繫的人群。一方面民族體以創造及追溯共同歷史記憶來不斷的維持或修正族群邊界，另一方面，任何個人或人群團體，除非有明顯的體質外觀的差別，都可以藉由假借一個歷史記憶，或遺忘一個集體記憶，來進入或退出一個民族體

(王明珂, 1993: 10)。

透過這個故事幫助我們掌握到一個時代的特殊意義與氛圍，根據《台灣大地震》一書中記載，1935年4月21日清晨六點零二分，台灣發生了一場芮氏地震儀七點一級的大地震，造成中部區三千二百多人罹難。這三千多人中，有一個十二歲的公館公學校的三年級學生名叫詹德坤，地震當天，詹德坤正好在石圍牆伯母家。房屋倒塌，詹德坤被柱子打中，頭部受重傷，右大腿骨折。被送到福基臨時救護所時已太遲，次日中午再轉送苗栗醫院。地震第三天，詹德坤陷入意識不清的病危狀態。就在彌留之際，校長橋邊一好前來慰問，詹德坤突然起身唱出日本國歌「君が代」。歌曲尚未結束詹德坤已氣絕身亡（森宣雄·吳瑞雲 1996: 163）。強震隕命後，詹德坤被豎立銅像；他的故事編進 1942 年（昭和十七年）國語三的教科書<sup>1</sup>中（周婉窈 2002:2）。包括日本在內，台灣、韓國、中國大陸、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日本殖民或佔領地區的小學生，都要上這一課—君が代少年。

這位詹姓少年是確有其人，不過地方上對於此事件卻眾說紛紜。反而在許多日本學者的著作或文章中都被提及過（森宣雄·吳瑞雲 1996；村上正彥 2002），可見此事有其一定的真實性以及流傳上的廣度。當然日本人會重視與傳播這一個故事，是相當容易理解的。例如村上正彥在 2002 年日本出版《「君が代少年」を探して台湾人日語教育》，內容敘述了他實地來石圍牆庄實地訪查「君が代少年」故事的經過。這歷經六十多年的神話，仍存在日本大東亞歷史的記憶中。

詹德坤以這種樣式辭世，在當時的時代氛圍下，無疑有它的感動力。這件事一傳開來，有人倡議立碑紀念。於是有人以台中二中黑潮寮生的捐款為

---

<sup>1</sup>詳細課文內容如下：昭和十年四月二十一日的早上，台灣發生大地震。有位名喚德坤的少年，是公學校三年級學生，今天早上也一如往常，醒來後洗了臉，就恭恭敬敬地向著神座禮拜。神座上祭有皇大神宮的人麻。祭拜完畢之後，由於快要用早飯了，少年走去要叫當時在外邊的父親。出了家門才走了一會兒，「轟」地響起可怕的聲音，地面、四周的房子都東搖西擺地震動起來。「地震！」少年這麼想。剎那間，旁邊建築物的土角向少年身上崩倒過來。所謂「土角」就是把粘土打堅固做成像磚一樣的東西。父親跟附近的人跑過來時，少年的頭部和腳都受了大傷，倒在路旁。雖然如此，少年一看到父親的身影，絕口不提自己的苦痛，卻問：「媽媽平安嗎？」少年的傷勢比想像的嚴重，當天下午，在臨時搭建的治療所接受手術。就算在最痛楚的治療當中，少年決不說台灣話。學校裡教過：日本人就是說國語的人；德坤不論如何辭不達意，自始至終都使用國語。德坤時時說著學校裡的事情、呼喚老師的名字、又呼喚朋友的名字。就在這個時候，有幾百個傷患被運來學校，老師們忙得不可開交，但一聽說德坤受重傷，就輪流來看他。德坤流著淚，十分高興。德坤說：「老師，我要早點痊癒，上學去。」老師也鼓舞他說：「是呢，早點復元，好上學去。」但是，傷這麼重，到底會變成怎麼樣呢？——老師想到德坤的不幸，不勝唏噓。第二天中午時分，少年在父母與級任老師的護送下，被送到遠處城中的醫院。那天夜裡，疲累而神智不清的德坤，在天將破曉時，眼睛睜得大大的，對在身旁的父親說：「爸爸，老師不在嗎？好想再見老師一面呢。」到這個時候，或許自己預感到即將遠行也說不家。不久，少年說：「爸爸，我要唱君が代。」少年閉上眼睛，好像閉上眼睛，好像在想什麼似的，不一會兒深深吸一口氣，清脆地唱出：「君之年華，千代，八千代」，德坤全心而唱的歌聲，感染了同在病房的人們的心，惻惻可聞。「小哉，石兮」聲音雖小，但仍很清楚地繼續唱著。四周響起啜泣聲。「茁然成巖，苔痕深重方亟」快到盡頭，聲音逐漸變弱。但願德坤完美地唱完整首歌。這天早晨，唱完「君が代」的德坤，在父母和眾人含淚的守護中，安詳地長眠了。（周婉窈譯）

首，募集到不少資金，邀請台南雕刻家淺岡重治為詹德坤鑄造銅像(周婉窈 2002:4)。詹德坤一周年祭的 1936 年 4 月 23 日，在公館公學校校園中盛大舉行「詹德坤少年頌德紀念像」的揭幕式，銅像與詹德坤本人同大小，化身為「君が代少年」像而復活(森宣雄·吳瑞雲 1996:165)。對於向銅像敬禮，許多人都還記憶猶新。每天上下學經過銅像，都要脫帽站好，恭恭敬敬鞠躬後才可離開，石圍墻邱順松先生說道：

銅像豎立後，公館公學校的學生，每天上學放學，都要脫帽向銅像敬禮。因為銅像就在校門的對面，連警察大人、校長，車內的人也要下車行禮後才得以通行。記得詹德坤忌日，日本和尚會來誦經，校長和郡守、詹德坤的家人、公館公學校的學生與教師會列隊於銅像前參加祭拜儀式。(邱順松先生口述)

另外公館國小校友饒振榮先生也有以下的回憶：

記憶中，校門(現在的東邊大門)對面，有個小小公園，豎立一座為紀今 1935 年台灣中都大地震時(公館地區死傷、損失慘重)傷重而臨將去逝時，唱日本國歌—「君が代」的母校學生詹德坤的銅像(當時被稱為「君が代」少年)，同學們上下課經過校門口，必須脫帽向銅像立正敬禮<sup>2</sup>。

公館公學校成為「君が代少年」學校，一躍成名；甚至校歌也改為由校長填詞的「吾等君が代少年」。

在日本內地的學校，教師被要求授課時，必須教學生「在殖民地的台灣，有這般對國語極熱心的實踐者」。藉以「促成全國兒童奮起」。至於比台灣還晚納入日本支配圈的朝鮮半島、馬來西亞、新加坡的兒童，詹德坤則被列為「異民族也能成為完全皇民的模範前輩」。身為震災罹難者在數千萬不同種族的兒童口中流傳(森宣雄·吳瑞雲 1996:167)。此外還攙雜災區實地拍攝情景，製成教育影片「君が代少年」，流傳各地。然而在「君が代少年」被收入教科書的同時，太平洋戰火燃起，與詹德坤同年代的台灣青年—包括詹德坤的同學與高唱著「吾等君が代少年」的學弟們，被大量動員到戰場與各佔領地，許多人就這樣沒沒無名的戰死了。諷刺的是，在日本統治台灣的歷史中，詹德坤的名字成為流傳海外最廣的台灣人。

## 二、事實真相

在田野過程中，訪問了許多石圍墻的耆老們，他們對這故事的真實性，都抱持著懷疑的態度。在皇民化運動中，統治當局亟望改變台灣人的宗教信仰，鼓勵民眾在家裡設置神座，祭拜大麻。官方建議台灣人在正廳設置神座的標準樣式，所謂「大麻」就是紙紮的祭品。為了配合皇民化運動，教科書強調詹德坤一早起來拜大麻，是對學童有示範作用，可以達到推銷日本宗教的效果。關於詹德坤禮

---

<sup>2</sup> 饒振榮〈賀公館國小百歲箴言〉《公館國民小學百週年專輯》苗栗縣公館鄉公館國小。2001，頁 276。

拜神座這個情節，十分懷疑是經人添加的。因為在 1935 年 (昭和十年)，皇民化運動還未興起，一般民眾並沒有設置神座祭拜大麻的情事。而像詹德坤這樣住在「土角厝」的農家，有神座的，恐怕少乎其少 (周婉筠 2002:9)。根據當時與詹德坤同樣年紀的石圍墻九十歲耆老邱老先生說：

詹德坤是大地震早上，去廟裡(揆一樓)玩，被廟的瓦壓到頭，才死的，教課書寫壓到的地點在家裡不對。那時皇民化還沒開始，哪有拜天昭大麻。

而另一位石圍墻庄耆老則是說：

詹德坤的故事，是橋邊校長一手編導出來的，當時地震，他頭破傷風。因為父母聽說可以用牛糞擦，結果發燒、發狂、說狂語。他父母應該聽不懂日文，學校老師視察將之說成要死之前唱國歌，拒絕講台灣話，堅持說國語 (日語)，表示學校教學成功，有愛國精神，皇民化成功，老師功勞大，結果校長升官了。(陳老先生口述)

詹德坤無視於父母不懂「國語」，唱著日本國歌向其告終，這樣的情節實在不合情理。然而，為了情節需要，將年僅 12 歲的詹德坤塑造成，徹底奉行說國語、忠於皇民精神，唱國歌，打從心底深處成為日本人，將其死亡莊嚴化。根據《苗栗縣鄉土史料》中記載，一位先後服務於中小學的退休校長徐先生曾評論說道：

在我看來，這個「君が代少年」(唱日本國歌少年)的故事是假的，皇民化政策推行最熾時，我們這些當老師的還被迫改日本姓名。說實在，人病的死去活來時，嘴裡喊著的恐怕是「我的媽呀！」而不是日本國歌，我們當老師的都很清楚，這完全是日本人為了推行皇民化政策而杜撰的謊言，目的是要宣傳軍國主義精神。(徐達賢先生口述)

另一位黃鼎松先生也直指這和吳鳳的故事一樣<sup>3</sup>。詹德坤的故事宣傳他是個好孩子，在自己受重傷時，卻不忘母親的安危。但是根據當地耆老說，詹德坤那時跟奶奶住在石圍墻，父母親住在大坑。大地震的當時根本無法得知父母的情況，何來的關心：

詹德坤那時跟阿婆住在石圍墻，他父母住大坑，沒有像教科書上說的大地震壓到時，馬上問阿爸，母親平安嗎。(邱老先生先生口述)

以「君が代少年」為宣傳題材傳播全台後，詹德坤的故事更被逐步改寫，為了增加其可信度。詹德坤被塑造為「令人疼愛、心地純正」，而在鄰居的心目中卻未必如此：

歷史往往會成為政客的工具，詹德坤的故事也是一樣，當初日本人強迫臺灣人改姓名，就是希望能夠同化臺灣人。我聽詹德坤的鄰居說，其實他是個極為調皮搗蛋的小孩。人臨終時說的話本來就不是很清楚，倒被日本人編成了故事<sup>4</sup>。(彭雙松先生)

<sup>3</sup> 引自《耆老口述歷史 (二一) 苗栗縣鄉土史料》1999：37。

<sup>4</sup> 引自《耆老口述歷史 (二一) 苗栗縣鄉土史料》1999：37-38。

到日本戰敗，「君之代少年」銅像是對天皇效忠的象徵，公館人們決定將其拆除。由於認為銅像對貧困的詹家家計或許能有幾分幫助，於是將銅像送還給詹德坤父母，據說詹家後來將銅像賣給「古物商」。如今，銅像的最終去向已不得而知（森宣雄·吳瑞雲 1996：168）。

### 三、莎鳶之鐘(サヨンの鐘)的歌聲

國內一首傳唱多時的歌曲《月光小夜曲》，是台灣人耳熟能詳的歌曲<sup>5</sup>，悠悠的曲調、輕輕的歌詞十分令人喜歡。但鮮少有人知月光小夜曲原本是一首日文歌曲《莎鳶之鐘》(サヨンの鐘)，只是被填上了中文的歌詞；然而，中文與日文的歌詞訴說的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

#### 莎鳶之鐘（中譯）

暴風雨吹襲著高峰山谷 洪流沖擊著獨木橋  
青春美麗的誰家姑娘 啊...紅紅的雙唇 啊...莎鳶

為了捍衛鄉土勇敢上沙場 雄赳赳氣昂昂英姿扣心弦  
肩上扛著行囊歌聲震山谷 啊...狂風暴雨中 啊...莎鳶

可憐一支春花落失激流中 滾滾洪水一去不復返  
迷濛的山谷中小鳥為你哭泣 啊...為什麼不回來 啊...莎鳶

青春美麗的少女真誠心 有誰能夠不為你灑淚  
南島的姑娘呀雖然天色近黃昏 啊...鐘聲永為你敲響 啊...莎鳶

為什麼這首歌曲竟然會在日治時期引起了極大的迴響，甚至到了光復以後，依然餘波盪漾。如果對照原文的歌詞，就可以發覺其中大有文章。因為歌詞所描寫的故事，是從《台灣日日新報》上一則新聞「蕃婦墜溪行方不明」的報導<sup>6</sup>，1938年9月27日，台北州蘇澳郡ソヨヘン社(今宜蘭縣南澳村鄉金岳村)少女沙鳶<sup>7</sup>(サヨン)，因為勞役輪替的緣故，為其老師（柿田警手）搬運行李下山，以便奉召入伍，在搬運途中不慎從獨木橋上墜落激流中以致行蹤不明。如其原文報導：

蘇澳郡蕃地利有亨社一四番戶戶主哈勇·麥巴歐六女蕃婦莎勇·哈勇  
(十七歲)二十七日早晨五時，由於利有亨駐在所柿田警手下山之故，  
與同社十一人一起送行，並為其搬運行李，由於利有亨社出發，途中

<sup>5</sup>月光小夜曲 王福齡 詞

月亮在我窗前盪漾，透進了愛的光芒，我低頭靜靜的想一想，猜不透你心腸，好像今晚月亮一樣，忽明忽暗又忽亮，啊~，到底是愛還是心慌，啊~，月光。月夜情境像夢一樣，那甜蜜怎能相忘，細雨猶在耳邊蕩漾，怎不叫我回想，我怕見那月光，抬頭把那窗簾拉上，啊~，我心兒醉，我心兒慌，啊~，月光。我心兒醉，我心兒慌，啊~，月光。

<sup>6</sup>台灣日日新報，昭和13年(1938)9月29日，7版。

<sup>7</sup>不同的論文，有不同的翻譯：如莎勇、莎韻、莎秧等。



經過塔比亞罕社下方南溪上架設的臨時木橋時，失足墜落於因前一天晚上豪雨而水漲的激流中行蹤不明。南澳分室岡田警部補、巡查、警手指揮南澳高砂族，搜查結果，在距離墜落地點約十五丁（按：一丁約合 109 公尺）的下游，發見莎勇·哈勇所擔送的該警手的行李箱二個，但尚未發現屍體。（引自周婉窈 2002:15）

從原始的新聞報導看來，原本只是為老師服勞役不幸溺水的事件，記者並未有任何強調期愛國情操的情緒描寫。然而從殖民政府的和蕃企圖看起來，卻逐漸被渲染神化成愛國之女沙鶯，其中不難想見殖民者的用心為何。此事件的高潮是 1941 年時，台灣總督長谷川清也特別表揚其「為國捐軀」的精神，特別頒贈「愛國乙女サヨンの鐘」一座，以資紀念。當時名歌手渡邊濱子看了報導，深受感動，特寫信給總督府，希望錄製哀悼沙鶯之靈的歌曲（周婉窈 2002:20-21）。爾後，哥倫比亞唱片株式會社灌製唱片「沙鶯之鐘」，邀請名作曲家古賀政男，與作詞者西條八十作詞作曲，由渡邊濱子主唱，風行全台，甚至也流行到日本內地（溫浩邦 1996:9-10）。當然音樂流行所至之處，殖民政府所召喚的愛國心與奉獻犧牲精神，自然也會隨著音樂的傳唱，進入殖民地人民的心中。特別是對於讓日本政府極為頭痛的高砂族，經過 1930 霧社事件以後，推動消弭泰雅族內心傷痛的理蕃政策，自然形成當務之急。「沙鶯之鐘」這首流行歌曲也順勢而為成為日本殖民政府理蕃政策的最佳代言人，一首音樂聲音的影響是絕對不可以小覷。

在殖民政府的鼓勵下，演唱以沙鶯事蹟的歌曲，也蔚為風潮。其中 1941 年哥倫比亞唱片株式會社專屬歌手佐塚佐和子返鄉演唱「沙鶯之鐘」更引人注目。因為她是一位日本人與泰雅族的混血兒，其父親佐塚愛佑是間接造成 1930 霧社事件<sup>8</sup>的當事人，也是被殺害的對象。其母是泰雅頭目之女亞娃伊·泰木（王淑津 1996），由她來演唱此曲不啻有強烈的和蕃意圖，也說明高砂族已經從抗日的情結中脫離，義無反顧的為日本帝國犧牲，就如同佐塚佐和子親口說出：「我也是番社之子，沙鶯替我們做了這樣的犧牲」（周婉窈 2002:22）。

#### 四、影響與後續發展

沙鶯的故事除了被譜曲傳唱之外，也影響其他的創作：如鹽月桃甫創作的「沙鶯之鐘」（王淑津 1996），名詩人青木月斗創作「沙鶯之鐘」為題的俳句，吳漫沙的小說「沙鶯之鐘」等，皆以此事件為創作的主題。而其中最為重要的是 1943

---

<sup>8</sup> 1930 年 10 月 27 日，在馬赫坡社（Mahebo）的頭目莫那·魯道的號召下，馬赫坡社、塔洛灣社（Tarowan）、波亞倫社（Baolum）、斯克社（Suku）、荷歌社（Hogo）及羅多夫社（Rodof）等六社，分批攻陷霧社分室、日警駐在所及日本人宿舍區，切斷警察專用電話線路，並取得武器彈藥，隨及埋伏在聯合運動場四周山區，蓄勢待發。當運動會開始，日本國歌揚起時，即衝進運動場，與日警激戰。在此行動中，計有 134 名日人被泰雅族人殺害，26 名被殺傷，及 2 名穿著日服者被誤殺。此霧社抗日事件爆發後，台灣總督府立即調派上千人，以山炮、臼炮、曲射炮、硫酸彈、燒夷彈、機關槍，並出動飛機轟炸、投擲手榴彈，都無法攻陷馬赫坡岩窟。最後以「以夷制夷」的方式脅迫「味方蕃襲擊隊」進入馬赫坡岩窟襲擊，結束了日人大規模的討伐戰役。抗日六部落的族人共計 1236 名，戰死者 85 名、被飛機轟炸死者 137 名、砲彈炸死者 34 名、被味方蕃獵首者 87 名、自縊身亡者 290 名（鄧相揚，1998）。

年由台灣總督府監製的影片「沙鷺之鐘」。此電影由當時名演員李香蘭(日名：山口淑子)主演。此片是台灣(台灣總督府)、日本(松竹公司)與滿洲(滿映)三方面合作的皇民化電影，拍攝地點選擇在南投霧社，而不是故事發生地點宜蘭南澳。家古賀政男與西條八十，再度作詞作曲，譜成「沙鷺之鐘」的主題曲《沙鷺之歌》，並由李香蘭主唱(周婉窈 2002:23)。

電影《沙鷺之鐘》<sup>9</sup>(1943)在票房上並不成功，卻足以讓日本藉此片宣揚效忠國家的意識，電影的場景從南澳移到霧社事件發生的櫻の社(春陽部落)。其殖民政府的意圖不言可喻，就是想消弭1930霧社事件以後泰雅族內心傷痛。影片所呈現是男耕女織、一派祥和的日本理蕃成果，1930年霧社事件的傷痕記憶以已不復再見。這樣的國策電影宣揚的是日本所帶來的現代化不扼殺文化，召喚的是殖民地人民的愛國心與奉獻犧牲的精神。

光復以後，去殖民化很自然地成為當局文化行政的當務之急。果然原本設置在南澳利亨社的總督長谷川清頒贈「愛國乙女サヨンの鐘」不見了，在原來出事地點設立的一座「愛國乙女サヨン遭難之地」紀念碑，碑文上的「愛國」與「サヨン」的文字也被塗抹。這曲子更是以《月光小夜曲》的面目，重新包裝，繼續傳唱原曲的旋律，但是原有的歌詞也完全遭篡改，變成簡化的男女情愛故事，有關沙鷺的故事完全不見，現在演唱此曲的歌手或聽眾，知道此曲原由，恐怕幾希矣。有趣的是，即使是光復後仍有一部台語片《沙容》確實是取材自「沙鷺之鐘」的故事情節，只是日本帝國變成了中華民國，故事情節的描寫也著重在愛情故事上面(李道明 1994:57)。即使如此，針對「沙鷺之鐘」這首流行歌曲的檢討，若只以當成殖民主義的工具來對待，只會陷入國家主義或民族情感的迷思中，卻忽略了音樂聲音的力量。

自今在許多研究中，都指出在田野的經驗中，一些耆老一提到「沙鷺之鐘」的曲子時，嘴中吟唱出的仍然是日文的原始歌詞，同時言談間每多流露出對昔日的懷念(王淑津 1996)。今天在南澳武塔國小不但將沙鷺的故事寫入了鄉土教材，小朋友們更以「沙鷺之鐘」的中文版(非月光小夜曲的歌詞)做為迎賓歌曲(溫浩邦 1996)。這種情景與在KTV唱著由「沙鷺之鐘」翻唱的《月光小夜曲》，卻全然不知故事始末的年輕人恰好形成極強烈的對比。而這種對比甚至成為日本NHK電視台製作節目的點子，1993年NHK到台灣製作了《聽見了虛幻之歌「沙鷺之鐘」》(幻の歌「サヨンの鐘」が聞こえる)。節目中以一個日本高女學生為主角，敘述她在台灣聽到翻唱成中文的《月光小夜曲》非常好奇，於是展開一場尋訪之旅。表面上是追溯「沙鷺之鐘」的來龍去脈，其實也是代表著日本人對

---

<sup>9</sup> 1943年由台灣總督府監製的影片「沙鷺之鐘」在南投攝製，拍攝地點選擇在交通方便的南投霧社，而不是故事發生地點南澳。由清水宏導演，並有原住民參加演出。在片中，沙鷺的男友沙布洛自日本念書返鄉，二人頗受祝福，卻引來另一男子摩那的嫉妒。影片中雖然以此男女三角關係為主，事實上其所宣揚的是對年青人奉召出征的榮耀，片中不管是泰雅青年或日本年輕教師都以收到召集令為莫大的光榮，否則就顏面盡失。故事高潮即是取材於南澳所發生的真實故事加以改編，變成沙鷺為了歡送日本武田老師奉召入伍，強忍高燒並冒險度渡河卻不幸跌落激流中，香消玉殞的情節。

戰爭的反省，以及反映出台灣原住民對日本的情結（林正芳 1995）。

誠如李歐塔(Lyotard 1988)所說在聲音的世界中是事件的世界(event-world)，G. Revill 在討論音樂在英國社會、經濟、政治空間的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時，他指出音樂只是視為承載歌詞的媒介，是透過歌詞傳達文字涵義，進行音樂實踐的空間性探討。Revill 個人認為事實上在社會、經濟、與政治空間的建構過程中，聲音扮演著重要而且積極的角色(Revill 2000:597)。「沙鴛之鐘」這首歌曲的形成與發展迄今近 60 年，音樂旋律本身的傳唱倒沒有經過篡改，倒是在歌詞所傳達的文意上，經過不同的社會、經濟、與政治空間，卻牽引出不同的意義以滿足不同人士抑或團體的需求，確實是「沙鴛之鐘」這聲音事件所引發出的不同意涵，讓人可以產生許多的想像空間。

## 參、Monarch-of-all-I-survey 的帝國之眼

### 一、 歐陸之旅

十九世紀歐洲中上流社會開始展開所謂的浪漫“歐陸之旅”(Grand Tour)，就是貴族們攜帶大量隨從遠赴歐洲大陸：地中海沿岸、義大利、希臘等地旅行，名為吸取知識，事實上是種身分地位的標榜。而這種大旅行之前身，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紀，但是以十九世紀初英國詩人華滋華斯(Wordsworth)的英格蘭湖區(Lake Districts)之旅最為著名，他在旅行之旅程中以詩文描寫山水景致。不僅深深感動了英國民眾，提昇了英國湖區的國際知名度，更因而使湖區山光水色變成代表英國的驕傲，更鼓勵了大多數的英國年青人勇敢地邁向旅程，不但挑戰自我也可以增加見聞(Urry 1995:193-204)。然而這種挑戰自我與增加見聞，在 Mary Louis Pratt 其探討英國維多利亞時期旅行文學的論述《帝國之眼》(Imperial Eyes)中，可能是一種特別能滿足西方優越感“君臨天下式”(monarch-of-all-I-survey)的觀察，旅行者站在陽光普照、視野遼闊的海岬上，山頂上，或著陽台上，把眼前的景物映入眼簾。在描述此種景觀時，作家常用三種技巧(Pratt 1992:204-205)：

- 一. 作家運用文筆將所見到的景觀描繪成一幅美麗的圖畫。
- 二. 賦予景觀豐富的意涵。
- 三. 觀察者全權操控全景，對所觀察到的景物完全掌握了文字傳達的權力。

若照 Pratt 的說法，這種描述正是所謂的“發現修辭”(discovery rhetoric)，也正訴說著一個君臨天下式的觀察。按照 Pratt 的說法，這些旅行的描述雖然都呈現對“異己”的包容與關懷，儘管如此，Pratt 對此卻是犀利的批判他們皆含有“帝國主義”的意識，是以反征服(anti-conquest)之名來遂行其文化征服之實：“反征服是歐洲布爾喬維亞(bourgeois)階級的一種策略，以保證當他們無知時能夠獲得確保，並同時能夠繼續歐洲的霸權”(Pratt 1992:7)。Wolschke-Bulmahn(1992)指出起源於十九世紀的“流鳥”運動(Wandervogel or Migrating birds)，是德國布爾喬維亞階級的年輕人興起的一種運動，代表著對於父母、學校、教會等所支配傳統社會的反制。為了逃離傳統的布爾喬維亞社會，他們結伴而行主動地親近自然

景觀。登山健行以便於自然景觀中探險則是其中最主要的活動，而登山健行也代表著從傳統資本主義社會現實中脫逃的意義。許多的登山者紀錄了其旅途的種種景緻，越來越多的旅遊經驗傳頌，竟也造就了一種理想的自然景觀，如傳送最為廣泛的映像代表是：“廢棄的廢墟；不規則的石塊；阡陌縱橫的田野；變化多端的田地與森林；掩熠的溪流；可愛的村莊；其茅草屋頂與風土建築。”(Wolschke-Bulmahn 1992:36-37)或是“我登上高塔欣賞壯麗景觀。地平線上黑色的森林對映著青天，夕陽金黃色光芒鑲嵌著白雲的邊緣。深谷中隱藏著安逸的村莊，好一片平和的景象”(pp.39-40)，類似的畫面其實就一直在歌德(Goethe)、Koch、von Schwind 等人德國傳統的繪畫與文學中傳送著。而此類的描述傳統似也成為當時文藝少年進行歐陸之旅，述景狀物的標準模式，如法國建築師柯比意(Le Corbusier)在《東遊記》文中，描述他在高地上觀察伊士坦堡的全景：“從制高點上我看到黃金角海峽越過小草原(Little Field)上的連綿蒼柏。在其下，伊士坦堡坐落在陰影中，雄偉的清真寺天際線映在陰沉的天空中。(中略)如果此時有陽光，則可見海景，清真寺連串的尖塔則像金線般點綴著陰暗的海邊”(Le Corbusier 1987:83)，少年柯比意正描述呼應著德國人歌德年代的理想景觀，同時也正是透過“帝國之眼”的“君臨天下式”觀察。

## 二、台灣山岳凝視：日本“君臨天下式”的觀察

從清代的台灣八景到日治時期的台灣新八景是有關台灣自然景觀的“發現修辭”，若對照以上的說明，事實上也像是透過帝國之眼複製著心目中的理想景觀。清代高拱乾《台灣府誌》首先出現台灣八景，而所謂台灣八景為：**安平晚渡、沙鯤漁火、鹿耳春潮、雞籠積雪、東溟曉日、西嶼落霞、斐亭聽濤、澄台觀海**。清代八景突顯的是官署中官員眼中的景緻，是屬於“泛視系統”帝國之眼的監看。到了日治時期的新台灣八景，不同於清代出於官員之手，是由昭和 2 年(1927)台灣日日新報舉辦《台灣新八景》票選活動中產生：**神域—台北神社、靈峰—新高山、台中八仙山、高雄鵝鸞鼻、花蓮太魯閣、台北淡水、高雄壽山、台南阿里山、台中日月潭、基隆旭岡**(宋南萱 2000:48)。有趣的是在原本候選名單中，台北神社只居於第八位，而新高山更在二十名之外，而最後此兩者被置於台灣八景之別格地位，以彰顯其特殊地位，其實無非是其政治操作。清代以“海”為主，清代台灣八景突顯當時政治中心—安平一帶的景緻，以及由大陸而來的文化來源。而日治時期台灣八景的象徵意義以“山”為主，則代表著台灣已從對大陸的認同轉移到對日本母國的認同。薩伊德(1978)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中提到十九世紀的法國人來到東方找的是異國情調，而不是企圖發現真相。就像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就曾說過：“我來東方只是找一些影像”(引自王淑燕等譯 1999:244)。W. J. T. Mitchell (1994) 也指出地景可以表現帝國力量，他以十九世紀的殖民帝國為例，指出殖民國家利用肖畫式(picturesque)的地景來編織“帝國夢工廠”(empire dreamwork)，以表彰帝國的權力。D. Mitchell (1996) 則另以偽善的加州果園灌溉區說明地景另一股力量，亦即資本家與外國勞工之間

的社會與文化鬥爭。因此不管是清代台灣八景或是日治時期台灣新八景都連貫著一條從本土延伸而來的主軸線，顯現出一種野心，從海岸到山邊，一種包山包海的制約與掌控，代表著制約異己文化的象徵。

而這種象徵最能具有代表性的是台灣新高山所顯示的意義，原名玉山的新高山，被日本天皇命名為新高山，一層是代表日本國土的延伸，另一層則代表國家權力的支配，如 A. Berque (篠田勝英譯 1990：20) 所言其命名的動機是：“像這樣的動機可以稱為：『依視線的支配』吧！事實上面向風景的視線，基本上是依據看的人意志左右的主權發動的行為，隨著連想作用，視線對於某環境多少明示性，甚至到達對此環境地域主權的象徵化，這是不用驚訝的。在古代的日本，所謂『國見』的儀式中被表現的，正是這個動機。『國見』是公開的儀式，在此進行中，天皇立於山頂，視線環視四方。像這樣表明對國家的主權。”其中“國見”就是一種君臨天下式，舉目四望莫非王土的帝國凝視。

### 三、新高山的帝國凝視

有關於台灣登山旅遊的記載除了散見在鳥居龍藏(1996)、森丑之助(2000)的台灣山地地區探險記載之外，《台灣登山小史》(沼井鐵太郎，1997)算是最有系統的。除了不可考的原住民歷史，玉山對於清領時期的漢人而言，僅僅是遙遠的傳說，因為所有關於玉山的文字描述，都只是缺乏實證的飄逸意象而已(戴寶村 2001：126-130)。爾後雖經過了開山撫番階段，但是是否有中國人登頂成功，根據日人沼井鐵太郎的說法，卻是查無實據的說法。

因此對玉山的探勘，應該是日治以後，在《台灣登山小史》也詳細登入日人與台籍人士登頂的歷史：明治 29 年(1896)新高山之測量完成，發現其遠高於富士山，日本明治天皇遂命名為新高山。同年(1896)日人本多林學與齋藤音作登上玉山，但僅登上東峰。其後，明治 31 年(1898)12 月德國人史坦貝爾(Stopel)成為首登新高山的外國人，但未登主峰，也只達東峰(楊宗惠，1996)。翌年(1899)有日人熊谷直亮、齋藤讓同樣也只登上東峰。直到明治 33 年(1900)鳥居龍藏與森丑之助(森丙牛生)，同伴登上主峰，完成首次登頂。明治 37 年(1904)臨時土地調查局技手高寸喜登山測量，並發行二萬分之一堡圖。另外明治 39 年

(1906)，川上瀧彌與森丑之助再度登上新高山，值得注意的是森丑之助在這次登頂過程中，在新高山頂峰設立了一個神社(沼井鐵太郎 1997：24-26)。在新高山頂建立神社，代表著台灣自然山岳景觀原始神秘的面紗被揭開，靈峰(日人對新高山之尊稱)頂上的日本神社對山頂的佔領，自然也具有再畛域化

(re-territorializing) 台灣的殖民意涵，也代表著日本帝國主義在殖民現代化“框架”台灣的意涵。除此之外，歷任台灣總督如：13 任石塚英藏與 16 任總督中川健藏二人皆登上新高山，總督登上全台最高峰，當然也象徵著日本帝國對台灣有絕對的權力，其有“征服”的意義(戴寶村 2001：132-133)。甚至在日本小學國語課文中，新高山也被納入課文當中，藉以“涵養國民精神”。高山山頂放置神祠不僅有教化的功能，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對於高山山頂敬神崇聖的觀念更加提

倡，如台灣山岳會常務理事出口一重便說過：“我台灣山岳會會員應心懷登山報國之信念努力精進，在皇軍進軍之際將同一步調，登山之際不忘以皇民意識為行動基準，到達登山目的地之後，要先對皇居遙拜，歡呼聖壽萬歲，齊唱國歌，祈求皇軍將士武運長久，對護國英靈感謝默禱，進行登高山之際，一路唱著愛國進行曲及本會選定的山之歌，使得皇民意識得以昂揚，士氣獲得鼓舞。”（引自吳永華 2001：133）。而此類歌頌新高山的歌曲，如藤村作填詞的”新高山”歌詞中：“聳立的神山在遠島之中永遠以尊貴的姿態站立著；明治天皇為之取名「新高山」，島人有誰會忘記呢？背負新高山之名是多麼令人戒慎恐懼的呢！”（戴寶村，2001：136），這又是何等的帝國之眼睥睨姿態。

另外日本殖民政府召集藝術家（如：水彩畫家丸山晚霞、攝影家岡田紅陽）針對著新高山繪製作品，特別是岡田的一幅“主山頂上”的作品，主題是新高山的神社，更是充分表現出帝國主義“馴化”的力量（宋南萱 2000：79）。更有甚者是透過這些名家（如：木下靜涯運用渲染強調新高山的高聳氣勢）所繪製的繪葉書（風景明信片），更是將新高山的形象廣為宣傳。前述柯比意曾對阿爾及利亞首府卡士巴(Casbah)進行無數的描繪，企圖利用美學訴求來彰顯其城市意象，利用其地理形勢與建築形式的有力對話，將地景轉化成獨特的詩篇。而這種透過繪畫的“發現修辭”是具有帝國主義的包藏禍心。如著名阿爾及利亞反法運動主將 Frantz Fanon(1925-1961)曾說過，在法國人的眼中，要贏取阿爾及利亞，就必須要贏取阿爾及利亞女人，而面紗代表著最具象徵性的反抗陣壘(Souffrant 1999:173-174)。

柯比意似乎也深知此道，在他的阿爾及利亞素描簿中，盡是帶著面紗女人的素描，甚至他也將卡士巴畫成一個帶著面紗的女人，阿爾及利亞的女人對柯比意而言；帶著面紗的女人是秘密的，而揭開面紗裸體的女人則是被征服的(Celik 1992:72-73)。B. Colomina 就認為柯比意的素描本身就是佔據陌生人的住屋，透過對阿爾及利亞女人恣意的描繪，柯比意進入住屋中，佔領與再畛域化(re-territorializing)了空間、城市、異己的意象(Colomina 1996：178)。因此柯比意的無數描繪是為其著名阿爾及利亞計劃的準備，如 Celik 就指明柯比意的阿爾及利亞計劃事實上是表現出法國政府的殖民想法，以保護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經濟的、道德的、戰略的利益（Celik 1992：74）。

以新高山而言，日本人透過了測量、勘查、繪圖、命名、立碑、立祠、全民登山、新高阿里山國立公園之設立，台灣新八景中別格地位的確定，何嘗不是一步步，一個階段接一個階段的描繪過程，不啻說明著日本殖民步步為營針對新高山的“框架”政策。尤其是台灣登山會的成員與參與描繪台灣新八景的藝術家們如石川欽一郎、鄉原谷統等，都是評選台灣新八景中有關山岳部分的重要成員（宋南萱 2000：53）。如此看來，不管是台灣新八景的選拔以及對新高山的崇拜其實是有跡可循的，日本人對台灣的統治也恍如是取法法國統治阿爾吉利亞的方式，最後的目標是在使殖民地徹底同化於殖民母國。而這種說法也在國內的台灣歷史論述中，得到相同的呼應（王育德，1993：114）。

#### 四、帝國理想地景的複製

從 1920 年初開始，台灣的新聞媒體與殖民政府正合作開展了將山野空間殖民化的策劃。兩者共同建構台灣高山的想像空間，在兩者推波助瀾之下，登山運動與台灣國立公園的策劃也正蓬勃發展（陳傳興 1997：64）。而其中國立公園成立，雖然是呼應以提倡觀光，強調國民保健觀念，宣揚殖民政府的愛護自然景觀政策有關，但是重要的是更具殖民色彩的國民精神振興。日人在新高阿里山成立國家公園的意旨中就說明：“國家公園為一國代表的傑出風景，由於接觸者將感受到日常經驗中難得的靈感乃至感激，養成煥發高調愛國蓬勃的大精神”（宋南萱 2000：29）。企盼透過國民旅遊，建立國民與國土間的情感因而產生對國家的認同。

大正 15 年（1926）台灣山岳會成立，並發行《台灣山岳》以及登山界與新聞界（特別是台灣日日新報）的密切配合，都擴大其影響面，正式宣告台灣登山運動已經從個人冒險探勘，進入集體行動的階段。而 1935-1936 年之間更是啓開台灣登山史的新歷程，台灣已經進入大眾登山的時代。台灣山岳會正是德國“流鳥”(Wandervogel)運動的台灣版，代表是當時台灣布爾喬維亞階級年輕人的運動。以昭和 12 年 8 月 7 日至 11 日<sup>10</sup>，台灣新民報<sup>11</sup>董事楊肇嘉和報社同仁所參加之登新高山之旅為例。參加旅遊的成員大部分是台灣新民報社同仁，身分雖是「記者」，實際上並沒有幾個是真正的記者，而是負責編輯、管理和行銷的高級職員。其餘的成員有學生、辯護士、醫生、製藥業等各種行業人士，涵蓋了當時台灣殖民地社會最具現代性、帶有菁英色彩的領域（陳傳興 1997：70）。

納粹德國在 1930 年佔據波蘭時，強制驅離波蘭人，並將原有波蘭的原野景觀徹底改造成德國人理想中的歌德年代(Goethe-age)的景觀，是指那些由詩人(包括歌德)以及繪畫中所呈現理想田園景觀，而這也正是種君臨天下式的景觀，再將德國移民移植在這個新世界營生，這是以政治力介入，完全可以不考慮被殖民者的感受，將所謂理想景觀強加在他人國土之上。值得注意的是，這整個計劃雖然是納粹黑衫隊領袖希姆萊(H. Himmler)領導的團隊負責，團隊成員大部分曾經參與過德國布爾喬維亞階級青年運動，而計劃的主要執行者 Meyer 更是德國“流鳥”(Wandervogel)運動的原來成員（Wolschke-Bulmahn 1992:41-42）。

日本兒玉—後藤時代時，奠定了殖民政治的基礎，也決定了農業台灣、工業日本的發展方向，開始農業移民台灣的政策，決定進行台灣農業移民的政策。根據台灣總督府 1919 所編印之《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中說明日本農民移植的必要性：(1) 統治的理由 (2) 國防及同化的理由 (3) 向熱帶地的民族發展 (4) 日本人口過剩的調節（矢內原忠雄 2001：154）。根據矢內原忠雄針對此些移民村<sup>12</sup>的描述，在東部台灣日人佔 17%，台灣人佔 30%，與西部台灣相比，可見

<sup>10</sup> 時間的推斷有昭和 9 年與 12 年之疑（陳傳興 1997：67）。

<sup>11</sup> 台灣新民報日銷 5 萬份，是足以與台灣日日新報相抗衡，代表被殖民者的民間喉舌。

<sup>12</sup> 總計日治時期，日本在台的移民村舉其重要的，計有西部地區：彰化地處縣境內的秋津移民村

東部的台灣是日本人的不是台灣人的，如其所言：“像花蓮港街，是純粹的日本市街。事實上，東部台灣是顯著日本化的，與西部旅行的印象完全不同。即得承認，比較西部，則東部已經建設起日本人的移民移住地。”（矢內原忠雄，2001：155）移民的發展地也”不僅以台灣為對母國之栽培殖民地的地位為滿足，即其使命，實在使帝國南方的寄泊地或中繼地。”（同前註）這不啻是德國將波蘭佔領與再畛域化、再移民的翻版。

## 肆、台灣博覽會的殖民意義

### 一、台灣博覽會

日治時期博覽會是殖民統治者用以宣傳的工具，日本一方面為誇耀在台的殖民成績，另一方面也展現帝國的實力。所舉辦過的幾次博覽會，分別是大正五年(1916)台北「台灣勸業共進會」，歷時 36 天參觀人數 80 餘萬，大正十四年(1925)台北「始政三十年博覽會」，大正十五年(1926)台中「中部台灣共進會」，歷時十天參觀人數 57 萬，昭和六年(1931)「高雄港勢展覽會」，歷時六天參觀人數 11 萬，昭和十年(1935)「始政四十周年台灣博覽會」，歷時 50 天參觀人數 275 萬。規模最為龐大當數「始政四十週年博覽會」最具代表性。展期為 10 月 10 日至 11 月 28 日共 50 天，會場有四處：第一會場設於台北公會堂，第二會場設於新公園內，分場在大稻埕太平公學校北側，另有草山分館。博覽會主要展覽內容有台灣物產及建設成果、日本各地風土物產介紹，滿洲和樺太(按：庫頁島南部)殖民地的治績、日本當代工業及國防科技成就、南洋地區風土名產等等，總計展出物件達 30 萬件以上，展覽期間參觀人數達 275 萬人（鹿又光雄 1935）。

日本殖民政府在台舉辦博覽會，其目的都是在於將台灣，這個日本首次獲得的殖民地，作為日本帝國經營殖民地的「櫥窗」；在這樣的情勢之下，對外「介紹新領土的真相」與「介紹經營殖民地的成績」遂成為當時上下一致的共識，而博覽館與博覽會也自然成為對外宣揚台灣真相與殖民地治績最直接而有效的手段（李子寧，1997:243）。以始政四十周年台灣博覽會為例，1935 年日人領台四十年後，有鑑於台灣的土地、林野、戶口、貨幣、度量衡、語言、文化等皆已統一制度化，鞏固了殖民統治的基礎。雖然歷經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全球經濟大蕭條，台灣經濟卻依然欣欣向榮，其在台的殖民經驗確實是值得大肆稱頌，故有舉辦始政四十年台灣博覽會之議，祈望藉此博覽會大肆宣揚，以作為其「南進政策」之準備。誠如其開設之趣意寫道：“原本瘴煙蠻雨之地，又有難治之刁民，以及獐狃之番民蟠踞，連李鴻章都慨嘆懸絕於世界文化之外的台灣，歷經日本施政四十年後，已是世界殖民史上難得一見的成功殖民地，其成就自然值得謳歌”（鹿又

---

（1932 年建，面積 881 甲，156 戶，780 人，今芳苑鄉）、豐里移民村（1936 建，494 甲，149 戶，745 人，今北斗鎮）、鹿島移民村（1937 年建，531 甲，128 戶，640 人，今田尾鄉）。在東部地區則有花蓮地區吉野移民村（1910 年建，1270 甲，242 戶，1210 人，今吉安鄉）、豐田移民村（1913 年建，172 戶，860 人，今壽豐鄉）、林田移民村（1914 年建，766 甲，171 戶，855 人，今鳳林鎮）（林志峯 1995:58-59）。



光雄 1935:1)。因此始政四十周年紀念台灣博覽會對於提升台灣本島之產業地位與人文振興躍進有極大之助益。一次大戰後日本經濟蕭條與帝國主義低迷之際，台灣博覽會不僅有助日本企業振興，也拓展日本帝國主義的精神。

## 二、博覽會之殖民意涵

薩伊德的“東方主義”書中提及東方在西方知識形成的過程中從未被徵詢過，而知識也是出自西方人的觀點，並非當地人的觀點。他們所觀察到的東方變成通則，這些固定不變的通則變成了判定東方的文本，西方挾著霸權與知識為工具，讓東方根本無力去修正這些文本，而這些文本變成了詮譯東方的制式工具，而薩伊德的觀點正可以對映著十九世紀的世界博覽會殖民意涵。

首先在十九世紀的世界博覽會展場的分區上，處處充滿著強權與種族的區隔。如 1876 年費城百年博覽會展場區分為拉丁區、日耳曼區、安格魯薩克遜區、美洲區以及東方區，其中黑色人種以及被殖民的原住民則被拒絕成立其專屬的展示區，而只能附屬於其殖民帝國的區域內。展示的內容安排，不管是科技或藝術，自然以殖民帝國的文明為主。被殖民者只能展示低層次的原始手工藝，而其中東方文明則是被視為置於其中，即高於黑色人種以及被殖民者，卻低於歐美白人國家(Bennett 1996:103)。同樣的在 1893 年芝加哥哥倫比亞博覽會中也呈現類似的情況，其展場的配置中，不管是規模、色彩以及設計在視覺效果顯現出不同文化的分級，被稱為“白色城市”(White City)的白色展示大廳代表著支配的文化，空間格局的安排理性化，順應著軸線、端景的布雜傳統，以凸顯美國文化的卓越性。另一邊稱為“中途道”(Midway)，相反的，既不雄偉亦不統一，是分散甚至是混亂的格局，則是分配給非西方的人種，包括東方人、美國土著印第安或非洲人種等等，以凸顯西方最好 (the west, the best)的觀念。可以說在這個博覽世界中顯現出一幅充滿歧視的地圖，更是東方主義偏見下的結果，充滿著性別、種族、帝國的歧視(Edwards 2000:37-38)。Z.Celik 曾指出巴黎博覽會的基地配置安排就顯現出權力的地理分配，如 1867 年巴黎博覽會的會場配置表現出兩套系統一是位於中心與內區的位置，另一則是配置於邊緣與外區的位置。前者則配置著容納代表西方文明的工業與藝術品展示的展覽館，而後者則以配置非西方的展示為主。就配置的區位而言，整個博覽會場區顯示出種族與國家差異的環宇體制 (Celik 1990:36-38)。

## 三、傲慢與偏見：博覽會中的種族觀

薩伊德在其書“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中指出，對於西方白人國家而言，次等或更低的文化具有可馴服、可傳輸的特性，讓這些下等文化在西方人面前被展覽出來，正如帝國巨大疆域之縮影(Said 1994:212-213)。事實上在十九世紀的博覽會中，透過類似的展示裝置(如：暗箱 camera obscura, 全景畫 panorama 等)，讓人們能夠超越時空的制限，不管是讓觀眾進入史前時代，或將世界不同角落同時展現在眾人凝視的目光前。然而這種目光是屬於都會、白人、中產階級、男性的目光，掌握著支配的權力，於是這種凝視的權力透過博覽

會中利用現代科技的展示裝置，充分再現出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對抗關係 (Bennett 1996:105)。

Z.Celik 評論 1893 年世界哥倫比亞博覽會時指出，異國風情是主宰著十九世紀美國對東方的感覺，爲了展示的成功，十分依賴真實的行頭以及土著的扮演。中東伊斯蘭國家根據其早先在歐洲各國首都博覽會中，已經排演過成功的公式或衆人所熟悉的老套，將一千零一夜的異國氛圍帶領到北美洲。於是奧圖曼 (Ottoman) 皇宮的內部實景、土耳其村落實景、土耳其人的交通實況、大馬士格的宮殿與帳篷的內部實景都一一呈現在美國觀眾的眼前 (Celik 2000:77-80)。1889 年的巴黎博覽會所展示的也是整個模擬村莊的實景展示，以一種類似櫥窗化的形式展現在白人觀眾的眼前。展覽館中虛擬的亞洲與非洲土著村莊與殖民城市竟也變成學者們知識論述的焦點，然而此類的展示確也意味著白人世界對非白人世界的詮釋權 (Bennett 1996:104)。R.W.Rydell 在對美國世界博覽會的研究中 (Rydell 1984) 也提供了最詳盡的示範，他指出博覽會的展示其實是將進化論的理念轉化爲生動的展示，將非白人社會，不管野蠻或進乎文明的，轉化成類似幻燈片似的人類學展示。在博覽會中優越白人的進化論藉著其進步的展示修辭，成功地向其白人同胞們宣示其成功的成就與其優越的民族性，然而在白人驕傲的同時也正反映著非白人社會的屈辱與自悲。

P. Stalleybrass & A. White 曾經指出十九世紀的博覽會刻意利用西方嘉年華傳統中怪異的想像力投射在異國的文化之上，如此在展示中呈現出一種正常的次序對應著另一種另類的次序，其實這種利用展示異國風味與本國格調並置的展示具有一種包藏禍心的功能，就是對全體國民的宣告與對其帝國優勢的確認 (Stalleybrass & White 1986:42)。又如 Celik & Kinney (1990:36) 指出：

十九世紀的世界博覽會旨在建立許多小宇宙，利用它以總結所有人類的經驗，包括過去、現在、並可以投射到未來。在其精心刻劃的次序中，也表徵出明顯的權力關係。次序與分類則已經排序與合理化不同的社會。在主辦國的博覽會委員會心裡，不同種族、性別與國家所形成的階層各有其定位。在博覽會會場中的展示，非西方文化根據主辦國的臆測，透過不同的形式被現出來。這些臆測則是根據主辦國早已存在的社會安排而定。

巴黎 1931 年主辦了首次的殖民博覽會，西方各國舉辦的博覽會本來宣揚殖民主義意識形態的意旨就十分地明顯，1931 年巴黎的殖民博覽會不外是將西方國家舉辦博覽會的企圖更加明顯化、公開化罷了 (Morton 1998:357)。在 1931 年殖民博覽會中巴黎都市的展覽館與殖民地的展覽館，代表白人都會的展覽館建築形式都是以 Art Deco 的式樣來加以設計，對於代表殖民地的展覽館建築形式則大凡以殖民地本土的式樣爲之。而代表此次博覽會的主題館由 Albert Laprade 設計的「殖民博物館」，其建築的外觀設計摒棄傳統的殖民地民族風格的設計，以代表都會的 Art Deco 式樣爲之。其外牆上的由 Alfred Janniot 所製作的浮雕包括 250 個人體與動物的「石頭織錦」，其中分爲五大洲，法國居於中央，非洲在其左，

亞洲居其右，大洋洲與美洲又各居另兩端。而圖象中有關殖民地人像的描寫一方面著重在其原始職業的描寫：農作與傳統藝術工作；另一方面則顯現現代工廠、鐵路、紡織廠、工人等代表殖民化的成果。這般圖像隱含著教化的涵義，說明若是殖民化未曾發生，則這些殖民地的子民將繼續鎖在永恆的社會中，守著祖先一成不變的職業。

#### 四、台灣博覽會的殖民意涵

若我們也依前述對歐美博覽會的討論來比較日治時期所主辦的台灣博覽會，可觀察出在台灣博覽會中有關展示台灣的內容，也應會有無可避免地遭受到被扭曲，被簡化的共同命運。首先我們從台灣博覽會中代表不同國家、民族、地區的館舍與參展攤位加以討論。其中第一會場（現中華路與中山堂一帶）包括：產業館、林業館、糖業館、礦山館、交通土木館、交通特設館、興業館、日本製鐵館、三井館、代表日本內地各地方政府產業的第一、二府縣館、福岡館以及代表殖民政府的朝鮮館、滿洲館。第二會場（現二二八和平公園、博物館）中除了代表一般工業建設的電器館、專賣館、船舶館；地方政府的東京館、北海道館、大阪館、強調文化殖民的第一、二文化施設館；代表軍事力量的國防館、京都館、愛知名古屋館等。

始政四十週年博覽會的趣意書中：“台灣為帝國向南及南洋發展的策源地，在產業、貿易、國際上都佔有重要的地位”（鹿又光雄 1935:1），因此在 1935 年台灣博覽會上展現此項企圖是很自然的。台灣博覽會中的南方館（大稻埕）建築為改良式的台灣建築風格，展示內容以南支（中國南方）為特色，有福建、廣東、汕頭、廈門之外；也有南洋特色為主的是香港、廈門、河內、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值得一提的是當時中華民國政府也派遣福建政府參與盛會，並提供福建省特產物介紹所參與展覽。另外尚有菲律賓、暹羅館兩個國家館。

從以上的說明，很清楚看出來，日本政府的用心與歐州諸國舉辦類似“殖民博覽會”的心態如出一轍，首先是館舍基址的配置上，代表殖民母國以及殖民地成就的產業與文化，自然放置在博覽會會場中的核心地位，如第一、第二會場，而代表台灣人民的原本的祖國（南支）或其南進對象（即其後來大東亞共榮圈染指的諸殖民地）皆被納入此博覽會場中的邊緣地位如大稻埕，其用心昭然若顯。日治時期日本台灣殖民政府，對外參加博覽會的「台灣館」的建築風格，通常以閩式建築式中國建築為主體結構，並且大量使用清遺留下來的古物做為裝置（程佳惠 2001:46-47）。

在台灣博覽會場本身，特別是台灣博覽會在台北火車站站前的迎賓門與 1925 年巴黎裝飾藝術博覽會(Paris Exposition Internationale des Arts Decoratifs)大門還十分類似(傅朝卿 1999:75)，代表日本殖民產業建設的各個會館大部分都採用了裝飾藝術風格(Art Deco)充分展現出帝國主義的雄心。而代表台灣本土的南方館則以中國南方傳統的地方風格行之，以便於與殖民宗主國的形象予以區格。不僅如此，一般宣傳品的圖像設計上代表殖民政府的形象則以 Art Deco 的風格

行之，相對的，代表被殖民的本土形象則以民族風格為之(姚村雄 1996)。其實其所包藏的禍心便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作祟。

而在展示內容展示方面，如在第二會場中以總督府博物館為場址的第一文化施設館內，雖然在博物館入口大廳中展示著宣示“台灣教育發祥地－芝山巖學堂”的大模型，可是進入各展示室內的展覽內容，卻是展示以“神社崇敬”做為國民信念之本源的主題，其中強調的是國民教育國語（日語）教育，神社崇敬的展示內容，皆以觀眾容易接受且在當時屬於先進現代化的展示裝置，如：虛擬實境 diorama 的方式加以展示，而在第二施設展覽館內，則展示著台灣漢人與原住民的內容，不但以原住民真實生活情境展出，其中有泰雅原住民的編織實況，更以真人真事的模擬演出。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漢人生活的介紹，展覽中我們會看到漢民族身著傳統服裝正在樟腦工寮中工作，剝除樟樹皮，以做熬煮的準備，同樣的也是真人實境的方式演出。依賴真實的行頭以及土著的扮演，台灣博覽會為了展示的成功，日本對台灣殖民地的異國感覺，與流行於歐美的世界博覽會一樣，是主宰著會場的展示。雷同的尚有對有關殖民地人像的描寫，一樣的著重在其原始職業的描寫、農作與傳統藝術工作；對殖民母國與殖民地的成就則顯現現代化的殖民成果。不管原始的或文明的，所有的展示轉化成類似幻燈片的展示。在博覽會中，日人藉著其進步的展示修辭，成功地向其日人同胞們宣示其偉大的殖民成就，然而在日人驕傲的同時，也正反映著台灣人的屈辱與自悲。

## 伍、幾何的方法

### 一、理性的空間

日本殖民政府基於衛生理由，施行市街改正計畫，其中以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臺北市街道排水工程（下水道）之設置為首，並於隔年（1897年）設立有關市區改正及衛生設施之審查機構－臺北市區改正委員會。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頒發律令第三十號「有關業經公告依市區計畫屬於公用或官用地區內之土地建物之件」，以方便都市計畫之進行。明治三十三年制定台灣家屋建築規則。另外，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成立了台灣總督府市區計畫委員會(溫振華 1985)。台灣的都市計劃令制定於日本本國之後，許多法令較內地（日本）進步，可以看出，在制定技術性規範上，殖民地亦提供了殖民本土一個試驗的場地。

以殖民建築來說，一項重要的功能乃是在於宣揚國威，顯示宗主國的強大與進步；這也就是何以總督府蓋得如此華麗、以及當時的勸業銀行（今日的土地銀行）型式如此穩重的原因。殖民地的建築要能吸引殖民地人民的視線，震懾其視覺感官，以達到被殖民者衷心臣服的目的，進而使其了解到，身為日本天皇皇民的一份子，是多麼光榮的一件事情。為了要攫取臣民的凝視，建築體的外觀與型式是表現的重點，華麗的宣示作用為最高指導原則，皆可以拿來作為設計與宣示之用；也因此，二十世紀初的台灣，仍然是日本帝國作為展現其所學之十九世紀歐洲殖民模式與建築設計的試驗場。

日本殖民政府對於台灣幾個大都市進行的市街改正，以及各式各樣官署建築的興建，都充滿了殖民者展現力量的作為，抹除舊時的生活經驗，進而展現出新統治者所帶來的整齊、進步、衛生的新生活空間；另外官署建築物的興建，以其華麗的外觀、高度的技術、以及懾人的量體，僅僅捉住殖民地人民的視線，產生敬畏佩服之心，進而體認到殖民者的偉大以及身為其中一份子的光榮。

以台北市為例，日治殖民城市是徹底的「刮去重寫」(palimpsest)，改變空間是為了抹除記憶，台北城由一個座北朝南的古老帝國邊陲的行政中心，被硬生生地扭轉為朝向日出之東(夏鑄九，2000:60)。殖民者對於城市空間的塑造，自然有自己中心的一套想法，並且在殖民地人民主體性缺席的情況之下，強加於城市與社會之中，而且如前文所述的，這一套方法還是日本向西方十九世紀帝國主義學習的第二手移植。城市空間的條理化及規律化，不僅是外在條件上對殖民地人民的一種規訓，更重要的，是要能轉變成內在的思維；在殖民社會這樣一個不對等、唯有殖民統治者發聲的景況之下，是一個沒有市民社會自主性，沒有市民公共空間的城市。殖民城市中即使是複製與移植了實質的公共空間，仍然是不具內容的「偽公共空間」，因為沒有政治的活動就沒有「公共領域」的發生(夏鑄九，2000:65)。直至1936年落成的「台北公會堂」(今中山堂)，表面上是一個供市民集會活動的場所，公會堂的前面更有著正式的廣場；然而，在它的旁邊就設有警察局，可想而知，這是一個徒具形式與胃納，卻無實質內容的場所，在這裡絕對不會有市民輿論的發表與討論。

## 二、理性的時間

1895年6月17日，台灣總督府正式宣佈「始政」，為了讓人們知道正確時刻，總督府從1895年6月27日起，在台北市西門城垣上實施「午砲」，即每天11:30時發砲提醒人們校準時刻。只是開始實施時只能震驚台北城，尚無法在全台灣各地統一實施(呂紹理1998:53-54)。有關其他地方「午砲」的實施，1913年台南市是由民間自行成立「午砲組合」，由各街坊分擔火藥、人事經費後實施。另外1921年6月27日起也在台中市開始實施「午砲」的制度，另外在當時台灣小說中，也有作家在作品中述及在台灣其他小鎮也有「午砲」制度的實施(同前註，p.63)。這種「午砲」制度的實施，不啻說明理性的時間第一次進入了台灣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導引人們日常生活作習的基準。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傳統「烽火台」式的報時制度也漸漸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各式各樣的報時方式，以提醒人們的正確時間觀念。日本殖民政府為了導正台灣人的時間觀念，特別從1921年起規定每年6月10日為所謂「時的紀念日」，藉以擴大宣傳準時、守時的精神(同前註，p.63-67)。

日本殖民政府透過人們的生活中的許多人工音制約著生活的節奏。在當時社會中，聲音透過傳聲筒、大型喇叭、汽笛訊號、鈴聲，制約著我們的生活空間，控制著我們的生活節奏與脈動。在“一九八四”式的人民公社中，人們依循傳音筒的聲音指示操作日常作習，生活是被動的。而這種藉由聲音制約台灣人民

生活作習的實際例子，根據呂紹理(1998)《水螺響起》一書中的研究，說明日治時期在糖廠蔗田工作的農村佃農，並不是藉由自己的生理時鐘決定自己的作習，完全仰賴糖廠汽笛聲（鄉下人稱為水螺聲）通告農場上下工的時間。不一定住在糖廠中，只要住在糖廠附近，每天也一定聽得到這種工作的訊號。蔗田中的佃農知道當「水螺」響起時一定要趕到田裡，否則工作會被搶走。另外在皇民化運動時期，農村村民知道當村裏的鐘聲響起時，一定要放下手邊的所有工作到場子集合，否則就會遭受責罵處罰。日本殖民政府為了導正台灣人守紀律與重時間的觀念，利用嚴格的規定加以制約，而在其中，傳聲筒、大型喇叭、汽笛訊號、鈴聲等所傳遞的聲音竟也成為最大的幫凶。

1925年廣播開始在台灣出現，從生活作習的角度看來，廣播是最具有「共時性」的效果。以日治時期的收音機體操(ラヂオ體操)為例，這項1932年在日本開始，1934年則台灣總督府文教局宣佈於全島實施的「廣播體操」。夏季於清晨6:30播出，冬季則在7:00播出，1938年5月起則增加下午2:40一次，成為台灣社會每日重要的活動之一，可以想像當時全台各地不分老少，只要收聽得到收音機體操的地區，大家同時運動的景象，收音機體操體現日本政府透過廣播達成的動員效果。每年夏季早上更舉辦連續十天進行30分鐘的萬人體操活動，並名之為「全台灣ラヂオ體操大會」(呂紹理 1998:170-171；何義麟 2000:303)。以1938年為例，全島共有900個會場，參加人數共達二百萬人(何義麟 2000:303)。透過廣播的鉗制，呈現出一個殖民政府在共同時間內，對其人民施行對身體支配權的偉大場面。

1925年後藤新平在東京放送局成立致辭時指出：廣播事業具有促進文化機會均等、革新家庭生活、提升社會教育、活絡經濟機能等功能(呂紹理 2002:305；何義麟 2000:300)。而日本文部省也通令以廣播應用於公民教育與思想教育，不但要求學校在適當時間集合在禮堂或大操場聆聽。同時也在公眾集合場上，室內外皆然，一律加裝擴音器，以達成其廣播教育一般民眾的功能(葉龍彥 1999:113-114)。在台的日本官員則認為台灣的廣播事業應朝向完成內地延長主義、促進內台融合的目標前進(呂紹理 2002:305-306)。不管是學校教育或社會教育，日治時期從國民精神總動員到皇民化運動期間，利用收音機廣播一直是日本殖民政府倚賴的最好教化工具(何義麟 2000:302)。

中日戰爭期間，台灣總督府為了戰爭宣傳，從1937年開始就增加台語新聞廣播的時間，其新聞內容大抵上以戰情報導為主<sup>13</sup>。以當時台中街頭為例，晚上台語新聞的節目時間一到，店家門口就聚集一群黑壓壓的人群，收聽擴音器播放出來的新聞。街頭上人群聚集收聽廣播，就成為當時台灣城市中常見的街景(何義麟 2000:305)。從清晨到夜晚，台灣的天空中飄送著充滿支配的聲音，日本殖民政府利用廣播有效地進行對台灣人民身體的支配。從1928年11月10日，台北廣播電台還在試播期間，就已經成功地轉播日本裕仁天皇登基的實況，讓日

<sup>13</sup> 如在吳新榮日記中，記載著他從收音機所得知的消息：山本五十六司令官戰死、日台航線輪船被潛艇擊沉、英美聯軍攻陷巴黎等(引自何義麟 2000:304)。

本各地廣播電台聯播紫宸殿儀式的實況，日本首相恭呼萬歲與全體隨著歡呼的聲音在台北市的收音機中播放出來（葉龍彥 1999:100）。1945年8月15日中午台灣與日本本土的臣民皆肅立恭聆裕仁天皇的「玉音放送」廣播，得知日本戰敗投降的消息，是台灣近代歷史令人難忘的時刻。這幾幕攸關台灣前途命運的歷史場景，聲音毫無疑問地具備了最主要的支配性。收音機廣播都扮演極關鍵的角色，並且這幾幕歷史時刻是同時性地主宰台灣人民。

## 陸、輿圖建構與水利建設、輕便車建設

日本殖民政府對台灣做了詳盡的土地調查之後，即是繪製與建構大量的地圖，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繪製的台灣堡圖，以及大正十四年（1925年）的台灣地形圖（軍部圖）。這些地圖可說是台灣首次出現精準、詳細的全面性地景描述；殖民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與經費，採用科學的方法，詳實的紀錄下台灣的地貌，許多地圖至今仍有極高的準確性，且當時作三角測量所訂下的樁位，至今仍是台灣三角定位的基準。這些地圖如此廣泛又如此的精準，也就是說當地圖繪製完成後，整個台灣即赤裸裸地、一清二楚地呈現在殖民者眼前，一如 Mitchell 觀察到的。殖民地地圖的完成，在某個層面而言，正代表了殖民權力的確立以及殖民知識體系的建立（姚人多 2001:152）。以下的說明可以作為殖民政府輿圖建構的最佳理由及註腳：

當我在土地調查局翻閱各種不同的地圖及土地帳冊，（中略）這個島上的每一個城鎮，每一個村落，其確實位置都已經被掌握，每一個田地及農場，不管它們再怎麼小，我們也有它的面積等等的正確資料。當我們來到放置土地帳冊的房間時，後藤伯爵要求其中的一個官員向我展示某一個村落的地圖，該名官員看了看索引，隨即迅速地找到一張地圖在我們面前攤了開來，（中略）在這張地圖中，我們看到了稻田、茶園、小溪、山丘、森林，它們都是經過三角測量後精確地被畫上。（中略）只要有一隻鉛筆及一張像這樣的地圖，我們便可以輕易地計算出台灣的地形及地勢，就像是我們在看自己的手心一樣簡單。（摘自姚人多 2001:153-154）

日治大正年間出版的桃園水利組合地圖，可以判讀出桃園大圳與已存埤塘的相連關係，發現原本星羅棋布的埤塘，獨立也無編號系統，已經由於桃園大圳系統<sup>14</sup>的建立，變成阡陌相連，口口埤塘皆有編號，並且納入桃園水利組合管理的灌溉網絡。而在同一張地圖上，又可以看出另一個相通的網路，就是桃園台地上的輕便車路線網。Roland Knapp 曾指出桃園大圳與輕便車系統合力創造桃園台

<sup>14</sup>桃園大圳主圳橫跨八德市、內壢東邊、中壢市北邊、觀音鄉、新屋鄉，總共有十二條支線，支圳則途經桃園市、蘆竹鄉、大園鄉等地。每個支線至少皆有 13 個以上的埤塘（3 支線最少 9 個），最多有 35 個埤塘（即 8 支線）。

地農業奇蹟(Knapp 1980)，而這兩套系統清楚地印畫在這張桃園水利組合地圖之上。故以下的說明即以日治時期輿圖建構與水利建設、輕便車建設的關係提出近一步的說明。

### 一、日本在台的水利建設

在台灣開發史上，通常將水利開發看作土地開墾的一部份，灌溉系統建立，土地開墾即宣告完成。由於農業在日本殖民台灣架構中是主要的一環，而灌溉設施之興建，為農業發展的先決條件。因此，殖民政府非常重視水利事業的建設。日治之前，台灣原有埤圳多為私設；日本領台之後，日政府對於攸關農業發展甚鉅之水利建設，著手進行體質上的大改革，此時期屬於政府力量介入的發展型態，先制定公共埤圳規則，而在此時期攸關水利發展的重要法則有：(1) 1901年頒佈「公共埤圳規則」，(2) 1908年頒佈「官設埤圳規則」，開始以政府的力量統治灌溉事業。使公權力得以介入，監督其營運，接著興建規模較大的官辦水利事業，遂制定官設埤圳規則以作為依據，最後則制定統一性的水利組合規則，將水利事業納入統一的組織（台灣銀行 1950）。

而在水利建設方面，首推桃園大圳與嘉南大圳的興建，其中嘉南大圳更號稱是當時亞洲最大的水利工程。綜觀整個日本統治期間，埤圳灌溉面積由 1905 年的二十萬甲，到 1920 年的三十一萬甲，到了 1943 年的時候更是到達了五十六萬甲，整個水利設施的興建，對於農產品的增加有著莫大的助益。種種的水利建設，其目的莫過於使耕作的面積更廣、收成的效益更佳，以產生更多的稻米與蔗糖。桃園大圳使得原本貧脊的桃園台地有了穩定的灌溉水源，有利於水稻的栽種；而嘉南大圳是台灣最大規模的農田水利開發，其開鑿的目的，在於灌溉廣大的嘉南平原，使得蔗糖的產量更為增加。

### 二、桃園埤塘與水圳的發展

桃園台地在拓墾歷史上屬於臺灣西部開發較晚的地區，依據陳培桂《淡水廳志》的記載，桃園地區埤塘之形成，始於西元 1741 年（乾隆六年），由業戶薛奇龍及平埔族道卡斯族霄裡社通事知母六招佃築成霄裡大圳，這個灌溉系統包括大小四口埤塘及圳道，以供導水至現今八德一帶的六個莊的農田，完成後的水權分配，原住民的佃戶擁有六成，漢人佃戶擁有四成（陳培桂 1781：74）。西元 1748 年（乾隆十三年），通事知母六再度招佃挖掘靈潭陂（即現今所稱的「龍潭」），用以灌溉五小庄及黃泥塘一帶的農田（同前註：73）。隨著漢墾民的湧入，桃園台地上的埤塘的數量也急遽增加，最高曾高達八千餘口，占桃園台地 9% 總面積（台灣銀行 1950:18-19），各埤塘分別供應其所屬範圍內的農田之水源，其範圍涵蓋了現今桃園縣及新竹縣的湖口、竹北等地，將這片原本貧瘠而乾旱的地理區域轉變成魚米之鄉。

西元 1913 年（大正二年）因本地大旱，日本政府決定於石門開鑿取水口，築圳引導大料崁溪上游的水源進入桃園台地中，以及挖掘 20 公里長的明溝與暗渠及 166 公里長的幹渠與分渠，並整修 241 個埤塘用以調整灌溉水量。此時屬於



政府力量介入的發展型態，台地上凡灌溉面積超過 30 甲的私有埤圳，均經登記指定為公共埤圳，其數共 71，分佈於 143 個村莊中（桃園縣誌 1966）。此項工程於於大正五年（1916 年），完工於昭和三年（1928 年），隨後稱之為桃園大圳，其總灌溉面積達 22,000 公頃（陳正祥 1993:408；桃園縣誌 1966:147）。將海拔 100 公尺以下的地區全數轉變為水稻耕作區。對於埤塘而言，則由原本的看天池，變成了灌溉用水的調節池。

### 三、桃園大圳與埤塘網絡

此處利用台灣堡圖(1904)與台灣地形圖(1925)，並以桃園台地埤塘為例說明，利用關鍵性的幾個階段的地圖，觀察埤塘的前後變遷，特別把埤塘放在桃園大圳系統下作討論，以便掌握埤塘與水利資源的關係，此一部分將以桃園台地埤塘作為例子，利用關鍵性的幾個階段的地圖，觀察埤塘的前後變遷，特別把埤塘放在桃園大圳系統下作討論，以便掌握埤塘與水利資源的關係，並藉此突顯日治時期繪製的台灣堡圖以及台灣地形圖的精確性。

在這裡以桃園大圳第二支線十三號池為例，分別以 1904 年的台灣堡圖、1925 年的台灣地形圖、1955 年的聯勤總部測繪圖、1994 年農林航測圖以及 2002 年的最新版航測圖此五種圖來作疊圖，比較同一口池塘在近代將進一百年的時間中的演變。由比對的結果可知，此一埤塘在 1904 年時並不存在，至 1925 年形成之後，其面積與形狀並無太大的改變。在地圖比對的過程中，我們常常需要透過目標物週遭如道路、河川之類的事物來作為定位的依據，而此時即可發現繪製於日治初期的台灣堡圖與台灣地形圖，都與現今的地圖有極高的相似性，也就是意味其測繪的精確度與今日在高科技下產生的地圖並無二致。

### 四、輕便車道建設與城鄉發展

日治時期全台灣各地都設有輕便車道，最早是作軍事用途，後來亦作旅客運輸之用，英人 O. Rutter 1923 年的台灣行腳，見識到桃園台地上的輕便車，從他的觀察中，一眼看出此種台灣簡易交通系統的特性：

在台灣僅有大城市之間設有道路通行，大部分的鄉間只有依賴這種輕便車，輕便車系統全島總長度 550 英哩（885 公里）長。想到在鄉間開闢此種系統的人絕對是個天才。對於缺乏馬匹的台灣而言，這種輕便車道遠比一般馱運小路有用的多，特別遠從山區運送樟腦下山。

(Rutter 1990:214)

輕便車是以「台車」為載具，台車軌道的軌距寬一呎七吋半，台車的形狀則略似昔日鐵道上的手押車，但外形較小，台車速率每小時約十公里，下坡時可達十六公里，車上置有制動器，在急坡處可以煞車。台車分為客、貨車兩種，客車還分為一、二、三等級，一等僅供兩人乘坐，上加頂蓋遮雨蔽日，下鋪籐製座椅；二等則無頂蓋；三等則無頂蓋也無籐椅，可乘四人。桃園過去乃依附大料崁溪而發展成內陸港口之轉運中心，其中以大溪、龍潭（三坑仔）一帶發展最為迅

速。當時大漢溪可行船直駛淡水港埠，大溪也成爲重要物資集散地。爾後大料坎溪逐漸淤積，航利漸失，轉而利用桃園街鐵路轉運。但大溪至桃園之間沒有便捷的交通運輸工具，在大溪碼頭集散的物資，都得靠著挑夫肩挑或牛車運送；民前八年(1904)成立的「桃園輕便鐵道公司」，鋪設桃園至大溪栗子園間的輕便軌道，全長十餘公里，這是桃園台地上的第一條輕便鐵道，其後由於廣大的客貨運需要<sup>15</sup>，陸續開闢 14 條新路線，分由三家公司承運(表一)。「桃園輕便鐵道公司」從桃園至大溪間開闢的輕便鐵道，適時解決兩地間的物資集散。民國卅二年(1943)，「桃園輕便鐵道公司」的輕便軌道業務雖然宣告結束。桃園大眾運輸也正由此起源，因爲「桃園輕便鐵道公司」正是桃園客運公司的前身。

表一 輕便軌道路線里程興廢時間表

公司別	車站數	台車數	軌道路線起點	全長公里數	建築時間	拆除時間
桃園軌道公司	35	340	桃園(埔子) — 大園	10.00	1911	1939 拆除
			桃園 — 竹圍	7.00	1919	1939 拆除
			桃園 — 南坎	4.00	1913	1939 拆除
			桃園 — 新庄	9.50	1913-1915	***
			桃園 — 大溪	8.90	1904	***
			八塊厝(更寮腳) — 中壢(青埔)	10.10	***	1939 拆除
			大溪 — 角板山	14.20	***	1953 拆除
楊梅軌道公司	16	74	新屋 — 石磊子	未詳	1929	1939 拆除
			陰影窩 — 大坡	19.80	1929	1939 拆除
			楊梅 — 坎頭厝	未詳	1929	1939 拆除
中壢軌道公司	22	223	中壢 — 龍潭	未詳	1918	1935 拆除
			中壢 — 觀音	未詳	1918	1953 拆除
			三座屋 — 新屋	31.50	1918	1935 拆除
			中壢 — 東勢	未詳	1918	1935 拆除
			新坡 — 草漯	未詳	1918	1935 拆除

資料整理自(桃園縣志卷四經濟志(下), 1966: 58-60)

從 1935 年開始輕便鐵道開始逐線關閉，而新的汽車道路卻以平行的方式開闢。由日治時期的地圖，1904 年的台灣堡圖、1925 年的台灣地形圖和現今的地圖相比對，可以發現所有舊時主要的輕便車道，到後來都轉變成了重要的運輸道路(省道、縣道等)。以桃園市爲例，舊時貫穿桃園市的兩條輕便車道，其中一條就是桃園市現在的永安路(110 號縣道)，而另一條則是現在的介壽路(四號省道)。再以中壢市爲例，今日的 113 號縣道(新生路、中豐路)、113 甲(金陵

<sup>15</sup> 其最高運量 1928 曾載運 396,016 人次，貨運達 168,204,800 台斤(Knapp 1980:215)

路)、112 號縣道(中正路)等,皆是由輕便車道轉變而來。在比對地圖時即可發現,舊時的輕便車道路線與現今的主要道路在路線上可說是一模一樣,如此即代表著當今台灣主要城鎮的形勢與方位,其實早在日治時期就已經確立了。

## 柒、結論

班尼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其著作《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中第十章提到”人口普查、地圖、博物館”三者有形塑殖民地的想像領域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Anderson 1999),在本文的討論中,除了這三個項目之外,從文中我們也引申出更多的例子:殖民地景、輕便鐵路建設、水利建設、博覽會、皇民化教育、幾何化的空間與時間等來說明殖民統治者的種種作為,及其背後所隱藏的意涵。一個外來的殖民政權要如何能夠有效控制與管理殖民地的一切,必定是透過它自身建構起的知識體系與認知架構,以一層層的歸納,將整個台灣「消化」進殖民者建構的體系之中,如此一來殖民者就可以完全的掌握,進而塑造殖民地「應有」的樣貌。

本文所討論的,即是殖民政府透過種種的「框架」來審視台灣以及塑造台灣,殖民者擁有一切的資源以及決定權,可以採取各式各樣冠冕堂皇的方式來施行殖民統治之實。殖民統治者期盼的是廣大的殖民地人民,皆能夠被馴化、進而認同殖民政府的所作所為,以形成殖民統治者所企求的殖民景況。以台灣山岳會所倡導台灣版的”流鳥”(Wandervogel)運動為例,當時台灣布爾喬維亞階級年輕人,紛紛參與殖民統治者透過官方媒體鼓吹的集體登山運動,享受著登頂鳥瞰著理想帝國景觀的樂趣。但若比較 R. H. Schein 討論十九世紀美國都市景觀與現代性的關聯時所說過:”鳥瞰著景觀的讀者,雖然是地景的觀察者,然而此景觀的空間次序卻有如權力的血脈般支配著觀察者,因此十九世紀末的地景讀者們是主動也同樣是被動”(Schein 1992:19)。而 J. Crary 更深度的詮釋所謂觀察與十九世紀現代性的含意,他認為”觀察”的拉丁文原意(*observare*)是強調某個人的行動遵從於其所觀察的規則與方法(Crary 1990:5)。由此觀之,當時台灣年輕階級的登山客是否因為鳥瞰著理想帝國景觀就改變其原先的觀念與堅持?確實是值得進一步的觀察。在陳傳興針對楊肇嘉的研究中,指出楊肇嘉耗費極大心力促成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竟然在其參與新高山登頂之後宣告解散,如其言:”「登新高山之旅」對楊肇嘉而言,他顯然不會只是一個觀光之旅,它匯集了如此多的「最後」與「不再」、「不在」”(陳傳興 1997:68),僅此一端即令人留有無限的想像空間。

而在其教化之下的台灣人民、那些被馴化的「良善」子民們,由於長期處於高度不對等的狀態下,逐漸地、不知不覺地,亦透過殖民統治者所建立起來的框架來審思整個殖民情境。諷刺的是,在此種模式之下,愈是菁英份子、愈是接受高等教育者,所受到的灌輸也就愈深,也因此產生了後殖民理論中所論及的自我與異己的矛盾,以及認同上的困擾,即使到了今日,許多老一輩的台灣人十分懷念日治時期的規律及次序。別的不談,以水利建設例子來說,曾經主導嘉南大

圳與桃園大圳興建的八田與一，八田在台時間長達 32 年，將其畢生所學專業知識幾乎均用在台灣，台灣人民儘管對日本的殖民統治諸多批判，然而，對八田與一卻極為尊崇和懷念。八田與一被台灣人民奉為神明膜拜，就如同比他早生一個世紀的一位英國印度殖民地的治水官員 Arthur Cotton 受到印度人民熱愛，視為神明一般(Wallach :160-161)，都可以稱為亞洲殖民地的佳話，只是在台灣發生的有不少。而在文中所討論其他如交通、城市建設等雖然是一種主體缺席的現代性殖民空間，但無可諱言的是，它們還是為台灣的現代化奠定了基石，當然這其中也包括建立時間性的觀念等。

甚至如 1935 年的台灣博覽會，雖然處處顯現的是殖民者心態的跡痕，但是若從積極面看來，這些已經塵封的史實，仍然可以給我們一些參考的價值：為了抗拒 2008 年北京奧運會以及接續的 2010 年上海世界博覽會之舉辦，不管是從政治、經濟、建設等層面，中國所獲得的正面效果也正是台灣必須承受的負面衝擊。由於感受對岸的威脅，催生了 2008 年台灣博覽會，即標榜主題為「**文明新視野、科技最前線**」的國家博覽會，計劃在桃園、台中、嘉義及台南等地高鐵車站舉辦，以奈米、生技等科技產業為主題，時間暫定 2008 年下半年，預計可吸引國內外觀光人數達 1,000 萬人次，帶動無數商機。然而此處討論倒不是討論 1935 年的台灣博覽會將對 2008 年台灣博覽會有甚麼影響，因為現在的台灣根本無任何的殖民地，也不是甚麼殖民國。相反的是，1935 年的台灣博覽會對 2010 年上海世界博覽會的對照。

歷史上，中國主辦之第一次世界博覽會，是宣統二年(1910)在江寧舉辦的南洋勸業會(趙祐志 1997)，而在殖民博覽會的論域中，此可謂是一個特例，如前述主辦殖民博覽會的目的即在宣揚國家建設成就，激勵國人的向心力，並對其殖民地的子民傳播殖民宗主國的權威。然而清末國勢不振，不僅無任何的殖民屬地，本身也遭受列強割據。冒然舉辦博覽會正好適得其反，因本國館之展品品質不佳，與它國甚至比起華僑館之陳列都不如。誠如當時一位參觀者感言：“遊此館(暨南館)而令人眉飛色舞，繼遊外參考館，而使我瞿然驚悚然懼焉。考其陳列品，無一不佳，無一不合乎實用，無一為吾國目前急需待用之物。”(鍾少華 1991:103)。試想經過了整整一百年，中國已經從積弱不振轉為亞洲強國，從民族主義的考量上，這個博覽會有可能成為具有殖民意涵的博覽會，以誇大其國家建設的成果。屆時在統戰路線的考量上，所謂的台灣館勢必將是此博覽會上的焦點，而主辦單位將如何的形塑此館的位置、內容、建築形式將是一件可以論述的主題，而其中可能的答案，事實上可以從本文的討論中得到提示，大家可拭目以待。相對的，我們如何因應這即將出現的現實，似乎未見到政府有任何想像力豐富的動作。經過本文的討論，或許可以引出一套完善的防制規劃，這也算構成本文研究另一目的罷！

## 參考文獻

- 不著撰人(1936)《始政四十周年紀念臺灣博覽會寫真帖》，大阪：細谷真美館。
- 王育德（1993）《台灣－苦悶的歷史》，台北：自立晚報
- 王明珂（1993）〈集體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當代》，90期，pp.6-19
- 王淑燕等（譯）東方主義(Orientalism)，（1999）台北：立緒
- 王淑津（1996）〈莎勇的圖像：鹽月桃甫與泰雅原住民畫作〉《宜蘭文獻雜誌》，20期，pp.24-50
- 矢內原忠雄（2002）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台北：海峽
- 李子寧（1997）〈殖民主義與博物館－以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博物館為例〉《台灣省立博物館年刊》，pp. 241-273
- 李道明（1994）〈近一百年來台灣電影及電視對台灣原住民的呈現〉《電影欣賞雙月刊》，12(3)，pp. 55-64
- 呂紹理（1998）《水螺響起：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作息》，台北：遠流
- 呂紹理（2002）〈日治時期臺灣廣播工業與收音機市場的形成(1928-1945)〉《政治大學歷史學報》pp.297-333
- 吳永華（2001）〈台灣高山神社：南湖大山神祠的建立〉《宜蘭文獻雜誌》，51期 PP.123-136
- 宋美華（1997）〈自我主體，階級認同與國家建構：論迪福、菲爾定和包士威爾的旅行書〉，《中外文學》，26卷，4期，pp.4-28
- 宋南萱（2000）《台灣八景：從清朝到日據時期的轉變》，中央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志峰（1995）《國人對日式住宅室內空間使用之適應性研究》，中原大學室設系碩論
- 林文騫（1966）《桃園台地之水文與水利》，文化大學地理所碩論
- 林正芳（1995）〈莎韻之鐘的迷思座談會後記〉《宜蘭文獻雜誌》，12期，pp.96-101
- 林會承·劉興朋（1996）《桃園之陂塘調查研究》，桃園：桃園縣文化中心
- 高拱乾（1960）《台灣府志》，台北：台灣銀行重印
- 村上正彥(2002)《「君が代少年」を採して台灣人日語教育》
- 何義麟（2000）〈日治時期臺灣廣播事業發展之過程〉《回顧老臺灣·展望新故鄉：臺灣社文化變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師大歷史學系與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合編，pp. 293-311
- 周婉窈（2002）《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台灣史論集》台北：允晨
- 臺灣銀行（1950）〈台灣水利問題〉，《台灣研究叢刊》，第4種，台北：臺灣銀行
- 篠田勝英譯 オギユスタン・ベルワ(A. Berque) 著（1990）《日本の風景・西歐の景觀：そしこ造景の時代》，東京：講談社
- 森宣雄·吳瑞雲（1996）《台灣大地震》，台北：遠流
- 黃昭堂（2002）黃英哲譯《台灣總督府》，台北：前衛
- 姚人多（2001）〈認識台灣：知識、權利與台灣在台之殖民治理性〉，《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2期，pp. 119-182
- 姚村雄(1996)，臺灣日據時期「始政四十年紀念臺灣博覽會」宣傳計劃與視覺設計研究，台中商專學報 28 期，頁 681-710
- 沼井鐵太郎（1997）吳永華譯，《台灣登山小史》，台北：晨星

- 森丑之助 (2000) 楊南郡譯《生蕃行腳：森丑之助的台灣探險》，台北：遠流
- 烏居龍藏 (1996)《探險台灣：烏居龍藏的台灣人類學之旅》，台北：遠流
- 桃園縣政府 (1966)《桃園縣誌》，卷四，經濟志 (上)，桃園：桃園縣政府
- 桃園縣政府 (1966)《桃園縣誌》，卷四，經濟志 (下)，桃園：桃園縣政府
- 桃園縣文化中心 (1996)《龍潭陂畔話從前》，桃園：桃園縣文化中心
- 溫振華 (1985)《二十世紀初之台北都市化》，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
- 溫浩邦 (1996)〈歷史生產的多重性：罷工、莎韻與歷史詮釋〉《宜蘭文獻雜誌》，20 期，pp.3-23
- 程佳惠 (2001)《1935 年台灣博覽會之研究》，中央大學歷史所碩論
- 陳培桂 (1781)《淡水廳志》
- 陳漢初 (1991)〈石圍牆月蹟通鑑〉《苗栗文獻》，6 期，pp. 156-180
- 陳正祥 (1993)《台灣地誌》·(下)，台北：南天
- 陳傳興 (1997)〈登新高山紀念片－由楊肇嘉新高山之旅談起〉《台灣史料研究 No.10》PP.62-86
- 夏鑄九 (2000)〈殖民的現代性營造〉，《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0 期，pp.47-82
- 鄧相揚 (1998)《霧社事件》，台北：玉山社。
- 溫浩邦 (1996)〈歷史生產的多重性：罷工、莎韻與歷史詮釋〉《宜蘭文獻雜誌》，20 期，pp.3-23
- 葉龍彥 (1999)〈臺北廣播電台的建置：臺灣廣播之始〉《台北文獻》直字 130 期，pp.87-118
- 苗栗縣文獻委員會 (1999)《耆老口述歷史：苗栗縣鄉土史料》苗栗：苗栗縣政府
- 傅朝卿 (1999)《日治時期(1895-1945) 台灣建築》，台北：大地地理
- 趙祐志 (1997)〈躍上國際舞台：清季中國參加萬國博覽會之研究〉，師大歷史學報，25 期，頁 287-344.
- 鹿又光雄(1936)《始政四十周年紀念臺灣博覽會誌》東京：凸版印刷株式會社。
- 楊宗惠譯註 (1996)〈史脫具 (Stopel) 之福爾摩沙島內地旅行暨新高山 (摩里斯山) 首次攀登 (1898 聖誕節) 記行〉《師大地理研究報告 25 期 》PP.141-176
- 鍾少華 (1991)〈中國第一次博覽會：南洋勸業會〉，歷史月刊，41 期，頁 98-103。
- 戴寶村 (2001)〈玉山地景與台灣認同的發展〉《國家認同論文集》，台灣歷史學會研究專刊 4 號，PP.123-145
- Anderson, B. (1999) 吳叡人譯，《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
- Bennett, T. (1996) The Exhibitionary Complex, R. Greenberg et al (eds) *Thinking About Exhibitions*, London: Routledge, pp.81-112.
- Bozdogan, S. (1988),Journey to the East: Ways of Looking at the Orient and the Question of Representation,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41/4, pp. 38-45.
- Celik, Z. & Kinney, L. (1990) Ethnography and Exhibition at the Exposition Universelles, *Assemblage*, No.13, pp.35-60.
- Celik, Z. (1992),Le Corbusier, Orientalism, Colonialism, *Assemblage* 17, pp.59-77.
- Celik, Z. (1996), Gendered Spaces in Colonial Algiers, in D.Agrest et al. (eds), *The Sex of Architecture* , N. Y.: Harry N. Abrams pp.127-140.
- Celik, Z. (2000) Speaking Back to Orientalist Discourse at the 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Edwards,

- H. (ed) *Noble Dreams: Wicked Pleasures*, Princeton: 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76-97.
- Colomina, B. (1996), Battle Lines: E. I027, in D. Agrest et al. (eds), *The Sex of Architecture*, N. Y.: Harry N. Abrams pp.167-182.
- Cosgrove, D. (1988) *The Iconography of Landscape: essays on the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Design, and use of past Environmen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rary, J. (1990) *Techniques of the Observer: On Vision and Moder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MIT Press.
- Edwards, H. (2000) Orientalism in America, 1870-1930, Edwards, H. (ed) *Noble Dreams: Wicked Pleasures*, Princeton: 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10-57.
- Foucault, M. (1979)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 Introduction*, London:Allan Lane
- Kerr, G. (1974) *Formosa: Licensed Revolution and the Home Rule Movement, 1845-1945*,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Press.
- Knapp, R.G. (1980) Push Car Railways and Taiwan's Development, in R. G. Knapp (ed) *China's Island Frontier: Studies i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aiwan*,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Press.
- Lavin, S. (1996),Colomina's Web: Reply to Beatriz Colomina, in D. Agrest et al. (eds) *The Sex of Architecture*, N.Y.: Harry N. Abrams, pp.183-190.
- Le Corbusier (1987),*Journey to The East*, Cambridge: The MITPress.
- Liotard, J. F. (1988) *Peregrinations: Law, Form, Ev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Mitchell T. (1991) *Colonizing Egyp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itchell, W.J.T. (1994) *Landscape and Power*,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Morton, P. (1998) National and Colonial: The Musee des Colonies at the Colonial Exposition, Paris, 1931, *Art Bulletin*, Vol. 31, No.2, pp. 357-377.
- Revill, G. (2000) "Music and the Politics of Sound: Nationalism, Citizenship, and Auditory Spac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Vol. 18, pp. 597-613.
- Robbins, J. "Presenting Japan: the Role of Overseas Broadcasting by Japan during the Manchurian Incident", *Japan Forum*, Vol.13, Issue 1, pp.41-54.
- Rutter, O. (1990) *Through Formosa: An Account of Japan's Island Colony*, Taipei: SMC
- Rydell, R.W.(1984) *All the World's a Fair: Visions of Empire at American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s, 1876-1916*,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ratt, M.L. (1992),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London: Routledge.
- Porter, D. (1991), *Haunted Journeys: Desire and Transgression in European Travel Writ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 Press.
- Said, E. (1978), *Orientalism: Western Concepts of the Orient*, Harmondsworth: Penguin.
- Said, E. (1994),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 Y.: Vintage.
- Schein, R. (1997) The Place of Landscape: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e American Scene, *Annals,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7:660-680.
- Souffrant, E. (1999),To Conquer the Veil: Woman as Critique of Liberalism, in L. R. Gordon et al. (eds), *Fanon: A Critical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pp.170-178.
- Stallybrass, P. & A. White (1986)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Transgression*, London: Methuen.

Urry, J. (1995), *Consuming Places*, London: Routledge.

Wallach, B. (1985) British Irrigation Works in India's Krishna Basin,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Vol. 11, No.2, pp.155-173.

Wolschke-Bulmahn, J. (1992), The Fear of the New Landscape: Aspects of the Perception of Landscape in the German Youth Movement Between 1900 and 1933 and its Influence on Landscape Planning,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and planning Research*, 9:1, pp.33-47.